

第52届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论坛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之间对话的可能性（1）

■ 论坛的宗旨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在过去的两届亚洲未来会议上举办圆桌会议，探讨应该如何研究日本。2015年7月在东京举办的论坛“追求日本研究的新典范”时，将焦点放在作为公共财产的日本研究之上。

保障东亚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的，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合作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日两国走向战争，这告诉我们，仅靠经济和贸易关系，无法建立稳固的和平。如今我们迎来了战争结束70周年，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培养本地区信赖关系的必要条件——“和解”尚未得到实现。

在战后的东亚，一部分区域之间达成了和解。但是这样的和解，是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判断和民间的“友好”活动带来的，无法长久持续。现在本地区人们追求的是以共有“知识”为基础的和解。

把日本研究培养成上述“公共学知”的意义不容忽视。近代日本和亚洲各国关系复杂。把日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上升为亚洲全体的共有财产，具有跨越历史的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连续两年以“日本研究”为主题，深化探讨。

下一阶段的课题是，探索是否有可能把“中国研究”、“韩国研究”和“日本研究”一样，上升到东亚“公共学知”的层面。但是三国为了构建知识的共有空间，首先必须在意识到历史认识存在差异的同时，寻找和创造出重叠的部分。迄今为止，三国的学者之间进行了种种对话，但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人员”之间的对话仍止步于表层。进行国史之间的对话，能开辟一条通向亚洲共有的“日本研究”“中国研究”以及“韩国研究”的道路。而为这样的研究创造良好环境、向世界宣传研究成果，无疑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解做出巨大贡献。

何为 SGRA?

SGRA 是以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世界各国知日派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其研究宗旨在于为勇于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将其研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等形式，广泛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由多国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凝聚多门科学智慧，构建跨领域网络，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SGRA 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一群专家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泛，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活动。为培养优秀地球公民做出贡献乃是 SGRA 的基本目标。详情请浏览主页。

(<http://www.aisf.or.jp/sgra/>)

SGRA 瓦版

每周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SGRA 论坛等的通知和世界各地 SGRA 会员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订阅 SGRA 瓦版。想要订阅的读者可以通过主页自动登录。

<http://www.aisf.or.jp/sgra/>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之间 对话的可能性（1）

日期 2016年9月30日（周五）9:00~12:30
会场 北九州国际会议场国际会议室
主办方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赞助方 东京俱乐部

主持人 彭浩（大阪市立大学社会科学系研究院副教授）
开幕致辞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常务理事）

※配有日中韩同声传译

< 第一部分 >

引言

为什么需要“国史之间的对话” ——“国史”与“历史”之间

6

刘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三国为了构建学识的共有空间，首先必须跨越历史认识方面的差异。迄今为止，三国的学者之间进行了种种对话，但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人员”之间的对话仍止步于表层。进行国史之间的对话，能开辟一条通向各国共有的“日本研究”“中国研究”以及“韩国研究”的道路。为这样的研究创造良好环境、向世界宣传研究成果，无疑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解做出巨大贡献。

报告

报告1)

韩国国史（研究和教科书）所阐述的东亚

10

赵珖（首尔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当前包括中日韩在内，东北亚国家围绕着历史的争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尖锐。伴随着这一现象，各国对本国历史教育的争议也越发激烈。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尽管东北亚的历史矛盾主要源自于（中日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及国家主义倾向，但韩国也并非毫无干系。本文将根据近期编纂并在学校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以及学界对日本关系史、中国关系史的阐述来看一下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倾向。

报告 2)

中国国史(研究和教科书)所阐述的东亚 ——以 13 世纪以后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15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本文选取 13~16 世纪发生在东北亚的三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蒙古袭来”(1274、1281)、“应永之役”(1419)和“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来讨论各国的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差异。如果历史叙述有若干个圆心,那么会形成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中,会出现很多和国别史不同的部分。在叙述单个国家的历史时,可能会忽略这些边缘,而在叙述东亚史时,作者认为有必要凸显几个历史圈重叠的部分。

报告 3)

日本国史(研究和教科书)所阐述的东亚

20

三谷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教授)

在日本,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育,都将历史分为日本史与外国史两部分。这一点对现代日本人的世界观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认为“日本处于世界(亚洲)之外”,将日本看作是包含亚洲在内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国家。

笔者以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依然持有这样的世界观是不恰当的。近些年来,笔者也在日本学术会议的史学委员会中提议高中历史教学应当开设一门将日本史与世界史合二为一的“历史基础”科。目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参考这类提议,正在研究下期学习指导要领,拟在类似的体系下开设一门“历史综合”的必修课。

在此,笔者以几本主要的教科书为素材进行分析,把握现行日本历史教育如何教授日本以外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东亚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理想的日本历史研究与教育应是怎样的。

< 第二部分 > 讨论

讨论 1)

民族国家与近代东亚

29

八百启介(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讨论2)

历史分析与史实个案的关系 ——以“蕃国接诏图”为例

34

桥本雄（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

讨论3)

中国教科书中描绘的日本 ——教育从“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转换

37

松田麻美子（早稻田大学）

讨论4)

如何正确认识东亚历史

44

徐静波（复旦大学教授）

讨论5)

开展“国史间对话”的建议

46

郑淳一（高丽大学副教授）

讨论6)

国史中的用语统一与目标设定

48

金罔泰（高丽大学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

圆桌会议·讨论

49

主持人：南基正（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参加讨论者：包括以上发言者及听众

闭幕致辞 李恩民（樱美林大学国际交流学群教授）

后记 ————— 56

报告人及点评人简历 ——— 59

引 言



为什么需要 “国史之间的对话” ——“国史”与“历史”之间

刘杰 (早稻田大学)

序言

首先是关于题目,使用“国史之间”是今西女士(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常务理事)提出来的。不是简单的“国史”,而是特意加上了“之间”。“国史之间”的提法至少有两层含义。

一是从研究、教育的角度来看,东亚三国有着各自不同的国史教育,或者说不同的教育和研究内容,其内容并不一定存在相互对话。三国从各自的角度对本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教育。必须让三国的国史进行对话。

二是指国史研究者们。研究者们通过共同研究的形式至今已经进行过许许多多的交流。从研究者的交流内容来看,很多情况是,与其说参加交流的人是研究各自国史的学者,不如说他们是研究对方近代史的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了解对象国。或者可以说是某种研究伙伴之间的交流。而实际上在各自国家从事国史研究或者教育的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活跃。应该让这些“研究者们”进行对话。我认为可以从这两层意义上进行理解,因此题目定为“国史之间的对话”。

我想在问题提起部分谈谈两三点内容,然后主要是恭听各位学者的发言。

一、为何进行“国史”之间的对话?

近十余年来,东亚三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对话,积累了丰硕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历史对话中,最受瞩目的首推 2006 年至 2008 年之间进行的共同研究。2006 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访华,中日首脑就两国学者年内启动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同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双方共举办了 4 次全体会议。2010 年 1 月,两国与会学者分别发表了以本国语言撰写的论文,并于 9 月发布了翻译版本。在中日关系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尝试,其意义极为深远。

不同国家学者间的“对话”,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理解。一是利用研究会或学会等舞台面对面交换意见,展开共同研究。另外一种则是以研究成果为媒介,不

断与对方进行间接对话。上面提到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虽然全体会议的次数较少,但是研究“国史”的学者们直接进行对话本身,即是一大进步。近年来,学者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这种对话,也确实实地加深了相互理解。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共同研究的近代史部分的研究报告就会发现,日方论文的论证几乎未参照以往的中方学者研究成果和中方史料。与此相反,中方的研究报告中,大量引用了日方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换言之,虽然两国对于历史的解读有着种种差异,但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方的史料和既有研究。在此研究状况下,让日方学者认识到同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的必要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中方虽然根据需要运用日方史料,但未必与这些史料进行了充分的对话。

解决中日间历史认识问题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学者们超越国家间的界限,建立所谓“知的共同体”(或者可以译作“知识共同体”、“求知共同体”)。而为了建立这样的共同体,在“共同研究”中,加强一直以来对话较少的“国史”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培养能够同对方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对话的研究人员极为重要。

二、由“国史”走向“历史”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中的“国史”学科,名称更改为“日本史学科”,以顺应国际化潮流。京都大学日本史学专业简介中有如下一段文字,阐述了日本“国史”教育的变化。

“日本史学,是一门诞生于日本列岛、力图从总体上把握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社会与文化的学问领域。(中略)当然,日本史学专业招收了众多留学生,对其而言日本史是外国史,因此我们并非单纯研究“相对于日本人的日本史”。而且,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东西方各地区的关联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这些,重新思考在日本大学中研究日本历史的意义。”

在日本将“国史”更改为“日本史”的同时,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着手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开始出版、刊载相关史料。“国史”概念的使用逐渐扩散,与不再使用“国史”概念的日本形成了对比。当然,在中国,有时为了强调同“党史”的区别而使用“国史”。另一方面,在中国,综合教科书中的“中国史”部分与“世界史”部分编制了新版“历史”教科书,在现实教育中推广使用。我们能否撰写东亚共通的“历史”呢?在摸索“知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该可能性进行探讨。

三、培养能够进行对话的“国史”研究人员

近年,伴随着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各自国家内部的“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同时也是大范围招收留学生、建立并完善留学生教育指导体制的结果。最近,经常可以听到“世界中的日本”与“世界中的中国”等说法。但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能够与日本“国史”对话的中方“国史”学者尚不多见。双方的“国史”学者通过史料译稿及翻译的研究成果与对方的学者进行对话。在很长一段时间,给予中国日本史研究重大影响的当属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该著作于1974年由天津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历史的范本,

并于 2011 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为众多读者所熟知。

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史研究”需要与亚洲或世界保持多大的距离，成为困扰日本学者们的一大课题。如果研究一下近两年的《日本历史》所载论文就会看到，仍然罕有引进外国史视角的“国史”研究。而且，每年 9 月期的特辑《座谈会 日本历史的论点与争议》的主题，分别设定为“御成败式目四二条论”、“古代女帝研究之现状”、“解读《昭和天皇实录》——战前时期的政治、军事、帝国”、“戊辰战争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国史”化的内容，与中国的交点较少。最近，以《昭和天皇实录》为主题的研究，由于是与战前政治、外交相关的内容，与往年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同中国的关系，但是仍然称不上是“国史”之间的对话。

为了将“国史”的对话落实到实处，在推进目前学者之间交流的同时，重要一点在于，需要创造环境使得 10 年后、或者 20 年后真正能够进行“国史”对话。在留学生数量增加的今天，双方的学者们应建立合作机制，培养精通日本语言与文化的中国史研究人员、以及精通中国等亚洲语言和社会文化的日本史研究人员。同时，在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合作机制。最近，我所参与的《日中近代史事典》编纂的项目，即同时是“国史”学者之间的对话，亦是为年轻国史研究人员创造环境。

今天的圆桌会议，首先是通过“教科书”，把握各国的“国史”现状。在各位老师提出各自的问题之后，请大家分别由教育与研究这两个角度，探讨“国史”对话的未来。

2015年～2016年《日本历史》所载论文题目

掲載号	題目	作者
2015年2月	藤原房前と河内山寺・興福寺福田院	谷本 啓
	室町期荘園制下の在地勢力と五山制度	斎藤夏来
	天保期水口藩の家中騒動	荒木裕行
	平時における政軍関係の相克—軍隊の雪害対応を中心に—	吉田律人
2015年3月	隼人の「名帳」	菊池達也
	「申」型裁許状の再検討	黒須智之
	江戸町名主馬込勘解由の明治維新	高山慶子
	江戸・明治期の日露関係—ロシアイメージを中心に—	黒沢文貴
2015年4月	宛所を輻射状とする伊達政宗書状	羽下徳彦
	『寛政重修諸家譜』の呈譜と幕府の編纂姿勢	平野仁也
	浜口内閣期における陸軍の対内宣伝政策	藤田 俊
2015年5月	中世における誕生日	木下 聡
	台湾出兵と万国公法—欧米諸国の対応を中心に—	小野聡子
2015年6月	源経基の出自と「源頼信告文」	藤田佳希
	後北条領国における新宿立て—原兵庫助訴状の検討—	山下智也
	近世後期の天皇避諱欠画令	林 大樹
	戦争芝居と川上音二郎—『壮絶快絶日清戦争』の分析をもとに—	伊藤俊介
2015年7月	徳川家達と大正三年政変	原口大輔
	陽成・光孝・宇多をめぐる皇位継承問題	佐藤早樹子
	近世西日本の皮革流通と地域—筑前国熊崎村を事例に—	高垣亜矢
2015年8月	昭和のなかの「明治」—明治百年記念準備会議を中心に—	小池聖一
	足利義昭の大名交渉と起請文	水野 嶺
	江戸周辺の地域編成と御三卿鷹場	山崎久登
2015年9月	「精神的共同作戦」としての日独文化事業—一九四三～四四年の日本における展開—	清水雅大
	山陰道節度使判官の長門守任官	松本政春
	戦国期越後における長尾晴景の権力形成—伊達時宗丸入嗣問題を通して—	前嶋 敏
2015年10月	公事方御定書の受容と運用—長崎奉行の「江戸伺」を通して	安高啓明
	衛生組合連合会と市制	白木澤涼子
2015年11月	『続日本後紀』の編纂—その原史料を中心に	多田圭介
	南北朝期大内氏の本拠地—弘世期を中心に	平瀬直樹
	日露戦前の水道敷設と地方都市政治—岡山市水道敷設問題をとおして	久野 洋
2015年12月	出羽国の東山道移管と陸奥按察使	永田英明
	佐賀藩築地反射炉と鉄製砲	前田達男
	昭和研究会の組織と参加者	山口浩志
2016年2月	当任加挙考—平安時代出挙制度の一側面	神戸航介
	南北朝末期の醍醐寺三寶院院主と理性院院主—宗助の座主就任の背景	小池勝也
	備中一橋領における年貢取納と石代納—安石代と間銀の問題を中心に	東野将伸
	明治期陸軍における歩兵科連隊将校団の構造	大江洋代
2016年3月	三好本宗家と阿波三好家—洲本・尼崎会談を事例として	高橋 遼
	長崎「海軍」伝習再考—幕府伝習生の人選を中心に	金 蓮玉
	日露戦後養蚕業の発展構造—西日本地域の成長と勸業政策・村落	加藤伸行
2016年4月	律令官人の朝儀不参をめぐって	虎尾達哉
	織田信長の上洛と三好氏の動向	天野忠幸
	細川幽斎島津領「仕置」の再検討	畑山周平
2016年5月	阿衡の紛議における「奉昭宣公書」	鴨野有佳梨
	明治二四年の皇室会計法制定—「御料部会計ノ部」の全章修正	池田さなえ
2016年6月	足利義昭政権と武田信玄—元龜争乱の展開再考	柴 裕之
	大念仏信仰の近世教団化と宗派間関係—宗派の形成をめぐる諸相	下田桃子
	近代東京における寺院境内墓地と郊外墓地	鈴木勇一郎
2016年7月	百濟滅亡後における倭国の防衛体制—斉明紀「繕修城柵」再考	堀江 潔
	揺れる後花園天皇—治罰論旨の復活をめぐって	田村 航
	近世長崎貿易での盈物の取締りと刑罰—長崎天保改革を転換点として	五味玲子
2016年8月	華族の期待と三条実美の政治行動	刑部芳則
	大化前代の隼人と倭王権	菊池達也
	安政四年における大廊下席大名の政治的動向—「同席会議」の上申書提出をめぐって	篠崎佑太
2016年9月	ワシントン条約廃棄問題と統帥権	藤井崇史
	駿遠両国における今川了俊・仲秋とその子孫	星川礼応
	終戦期の平沼騏一郎	手嶋泰伸

报 告 1



韩国国史(研究和教科书) 所阐述的东亚

赵珖 (首尔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高丽大学名誉教授)

序言

当前包括中日韩在内，东亚国家围绕着历史的争端比任何时期都要尖锐，伴随着这一现象，各国对本国历史教育的争议也越发激烈，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尽管东亚历史矛盾主要源自于中日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及国家主义倾向，但韩国也并非毫无干系。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带有单个国家历史观点¹，下面就根据近期编纂并在学校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以及学界对日本关系史、中国关系史的阐述来看一下韩国历史教科书的倾向。

一、对前近代中国的叙述

就我们而言，“中国”是一个代名词，代指曾出现在现代中国领土上的所有国家。现有观点将多次经历兴衰的中国历代王朝历史均归结为中国史，认为前近代时期东亚的霸主国家都建立在这片土地之上。然而，与“中国中心论”观点最背道而驰的就是高句丽史部分。教科书中记述道：“高句丽是东北亚的霸主，占领了满洲和朝鲜半岛，国土辽阔，形成了一个政治制度完备的大帝国，与中国平起平坐，国力不相上下。”此处所说的东亚是否将中国排除在外？所谓“与中国平起平坐”指的又是中国哪个朝代？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点使人接受了新罗与强大的唐朝联手灭掉高句丽的说法。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隋唐两朝不灭高句丽便无以称霸，于是反复挑起战争，最终导致高句丽灭亡。

这种历史认识是基于某种“华夷意识”，这一点在对北方民族的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关叙述认为，契丹和女真从高丽时期开始掳掠成习，用银子换取农具

1 以上摘自高英津，《韩国史教科书中的前近代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第25辑，2006年。

和粮食。似乎他们只是蛮夷而已，我们可以对其肆意征服和侵略。

在朝鲜时代与明朝的关系中，可以再次看到“吸收先进文化的文化外交”这一叙述。对于北方民族女真，则采用了所谓的“怀柔 and 讨伐的交邻政策”。对于清朝的叙述如下：“女真族曾向朝鲜进贡，朝鲜也认为女真族是蛮夷。与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建立君臣关系，屈辱地臣服，这给朝鲜人带来了巨大冲击。之后为了雪耻，同时为了对壬辰倭乱时出兵帮助朝鲜的明朝克尽忠义，朝鲜发起了北伐运动，意在向清报仇”，“与清朝建立了形式上的事大关系”。对于清朝的发展则叙述为：“清朝提倡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蛮夷女真所建的清朝结合了汉族文化和西方文明，成为一个文明国度，但是朝鲜却只和清朝维持了形式上的事大关系。尽管清朝成功地吸收了汉族的传统并适应了近代的西方文明，但终究摆脱不了蛮夷本质。²

二、对前近代日本的叙述

对于前近代中国的叙述中常常会出现“中国”这一代名词，但是却极少使用“日本”的说法，大部分是以“倭”、“倭寇”指称。直到7世纪后期，“倭国”才变成了“日本”。但是教科书中的叙述认为，百济“进入”日本九州地区，弃韩向倭出口铁，百济复兴运动中倭国水军曾援助百济复兴军。倭和日本的区别非常模糊。阐述传到日本的韩国文化时一直只使用日本这一国名，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表述，比如“三国文化传到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到了高丽时期，不再使用“日本”的说法，只使用“倭寇”。倭寇没有具体定义，只是叙述了倭寇侵略高丽的历史，书中对于日本中央政权并无叙述。

朝鲜时期与日本的关系也始于“倭寇”。书中提到，由于倭寇不断掠夺，朝鲜征服了对马岛。在日本的立场来看，“对马岛征伐”（又称“己亥东征”）就是侵略。这暴露出了韩国的双重标准，日本是侵略，韩国则是讨伐和进入。当然，壬辰倭乱和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程度无法相提并论。教科书中接着记述道：“对马岛征伐之后，朝鲜应倭寇的要求开放了三浦，即乃而浦、釜山浦和盐浦。”³

所谓壬辰倭乱（又称万历朝鲜战争）是指朝鲜和明朝联军在朝鲜土地上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这是三个国家共同的历史。现代韩国学界认为，壬辰倭乱是抵御日本侵略并获得胜利的民族斗争史，被视为“经验的历史”，是倍受学界关注的研究领

2 金正仁，《东亚的重构——以高中〈国史〉与〈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为中心》，《韩国社会教科教育学会学术大会志》，2008年。

3 金正仁，《东亚的重构——以高中〈国史〉与〈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为中心》，《韩国社会教科教育学会学术大会志》，2008年。

域之一。研究壬辰倭乱⁴似乎是一种时代要求，通过这种情感治疗来抚慰日本侵略带来的创伤。对外扩张时期，日本把对壬辰倭乱当作使侵略战争正当化的手段，韩国则通过研究壬辰倭乱来减轻殖民统治留下的创伤。

针对义兵活动和李舜臣海战的研究主题所占比重最高，这一研究倾向持续至今。而且这些研究都有着相同的观点，认为在政府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借助于地方两班、百姓及其李舜臣等英雄的力量，最终朝鲜才得以在战争中获胜。虽然在历史上他们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种“政府无能→日本侵略→英雄引领胜利”的结构却未必正确。虽然也有研究超越了个别主题，从通史的观点研究壬辰倭乱，但与上述结构并无大异。

柳成龙的《惩毖录》等朝鲜时代的史书对壬辰倭乱的一贯评价如下：“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问题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朝鲜朝廷无法抵抗侵略，甚至弃都城而逃，最终依靠义兵和战斗英雄的力量才取得战争胜利。”但是，单看这一部分，二战结束前日本方面的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叙述方式⁵。尽管这些研究是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要求，目的也不尽相同，但从结果来看，在战争的叙述方面最终采都了类似方式。

部分学者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⁶，但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从胜与败、善与恶、先进与落后的角度研究韩国壬辰战争史的观点。

一方面，韩日两国壬辰战争研究史中出现的传统倾向基本都没有注意到讲和交涉。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描述为明朝面对丰臣秀吉提出的无理要求，为了弥合中日关系对其进行了册封，却丝毫没有反映日本的要求，最终这一欺骗行径导致了失败。讲和交涉既可以有效地说明战争始末，也可以进一步解读东亚三国的势力版图，但是它并未被赋予这样的机会。

讲和交涉为何被忽视？首先，日本对外扩张时期的研究把讲和交涉被视为一种耻辱。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丰臣秀吉试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受挫，但他拒绝接受这

4 崔永禧，《壬辰义兵的性质》，《史学研究》第8辑，1960年。

李相佰，《第2编第6章 倭乱和对外关系》，《(震檀学会)韩国史》近世前期篇，乙酉文化史，1962年。

崔永禧，《壬辰倭乱》，世宗大王纪念事业会，1974年。

金锡禧，《壬辰倭乱中讲和交涉小考》，《文理大学学报》第9辑，釜山大学文理科大学，1966年。

李炯锡，《壬辰战乱史》上·下，壬辰战乱刊行委员会，1967年（李炯锡，《壬辰战乱史》上·下，新现实社，1974等修订增补）。

李铉淙、崔永禧，《外族的侵袭1. 十六世纪后期东亚局势，2. 日本的侵袭》，《韩国史 12 朝鲜两班社会的矛盾和对外抗争》，国史编纂委员会，1977年。

崔永禧、宋正炫、赵远来、孙宗成、李章熙、张学根，《壬辰倭乱》，《韩国史 29 朝鲜中期的外来侵略及其应对》，国史编纂委员会，1995年。

5 《两朝平攘录》、《惩毖录》、《武备志》等文献均认为，面对日本侵略，战争初期朝鲜惨败是由于政治混乱、缺乏战前准备所造成的。接触到这些文献之后著述的日本文献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金时德《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战争文献群》、《日本壬辰倭乱相关文献题解》，月亮图书出版社，2010年。（金时德《异国征伐战记世界：朝鲜半岛、琉球列岛、虾夷地》，笠间书院，2010概括。）这一逻辑被19世纪后期以后日本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背景下创作的诸多著述所沿用。解放后，韩国学界经过回归和反复，重新回到上述叙述方式。

6 许善道，《壬辰倭乱论——全新的正确认识》，《千宽宇先生还历纪念韩国史学论丛》，正音文化社，1985年。

崔永禧，《重新审视壬辰倭乱》，《国史馆论丛》第30辑，1991年。

崔永禧，《壬辰倭乱理解中的问题》，《韩国史论》第22辑，国史编纂委员会，1992年。

崔永禧，《对壬辰倭乱的几点意见》，《南冥学研究》第7辑，1998年。

一事实，“远征”的失败是讲和交涉者的欺骗造成的，因此讲和交涉也就完全丧失了研究价值。韩国解放后，学术界出现了“国难克服史”研究倾向，呼吁朝鲜王朝并非单方面战败，因此未能积极参战并妨碍复仇的讲和交涉必然带有负面形象。二战结束后，虽然日本国内的研究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反思，但是依然回避了讲和交涉部分，几乎沿袭了以往的叙述方式。由此可知，解放后韩日两国都极力回避对讲和交涉的研究。两国人都难以接受与预期不符的战争观点，因此许多与讲和交涉相关的史料都被人们所忽略了。

另一方面，对于壬辰倭乱时期明朝与朝鲜关系这一问题，包括上述研究在内，大部分研究都强调明朝参战的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本土，意在将日军的侵略阻断在朝鲜半岛。基本叙述版图也体现为战争期间明朝将本国意愿强加给朝鲜，朝鲜因此受害并试图抵抗。⁷

东亚历史教科书中的“壬辰、丁酉战争”和“丁卯、丙子战争”就是韩国历史教学与研究中所说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名称，是因为通过战争学习的目标内容不同。由于东亚历史将“减少矛盾、追求和平”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壬辰、丁酉战争”和“丁卯、丙子战争”时能够联想到和平。此时，为了实现教学目标，战争的背景和爆发原因以及战争带来的伤害等就成了核心内容。但东亚历史《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这一章节却并未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原因就在于教育课程评价和教科书编纂标准不合理。评价和编纂标准要求学生学习战争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探讨战争原因。在战争的影响问题上，既强调战争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强调战争对文化的积极影响。随着课改的进行，政府决定开设新科目的态度反映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想在前近代史部分强调东亚地区文化同源性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想在前近代史部分强调解决本地区现有矛盾，因此“东亚史”教育课程应运而生。所以今后重新修改教育课程时，“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的教学内容应该描述为“对于17世纪前后东亚地区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可以结合东亚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说明。”⁸

教材对朝鲜通信使的叙述中也体现出偏颇的一面。教材中叙述如下：“德川幕府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并学习先进文化，通过对马岛主向朝鲜提出了恢复邦交的请求”，“日本接受了朝鲜的先进文化，每当德川幕府将军换代时都请求朝鲜派遣使节，以保障其权威获得国际社会承认”，“通信使不仅仅是外交使节，同时还发挥了向日本传播朝鲜先进文化的作用”。教材仍旧将日本描述成需要一个朝鲜先进文化的国家，但这与17世纪日本开关以后发展迅速、实现了和平与稳定的叙述相互矛盾。这是否意味着，尽管日本已经通过荷兰等国家接受了西方文明、实现了大力发展，却依旧努力从朝鲜引进先进文化？“近代世界”中对日本的发展叙述如下：“日本中19世纪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大力推行近代化政策，最终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行列”。此处采用了“妥协”和“挤进”等表达方式来说明日本的近代发展。

总体来看，教材中前近代时期的日本是一个文化落后国，既是先进文化的受益

7 金敬泰，《壬辰战争时期讲和交涉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8 车美姬，《高中〈东亚史〉中〈17世纪前后的东亚战争〉分析》，《韩国史学报》第56期，2014年。

者,同时也是侵略者和掠夺者。这种认识可看作是近现代殖民地掠夺论的一种延续。受益者、侵略者、掠夺者的前近代日本形象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并不准确,而且由于教材出版和叙述制度等韩国内部错误引发的问题较多。如此看来,对日本形象的描述自然是有问题的。《国史》教材采取单向视角,未将日本视为一个关系主体,这无益于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存在的各种难题和建立理想的日韩关系。因此应该尊重史实,突破本国历史,立足于东亚宏观视角,从关系史层面来叙述日韩关系。换句话说,应该做成“关系历史学”,而非“划界历史学”。目前中日韩三国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正在效仿西方的国际历史教材合作运动开展历史教材交流合作活动。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活动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

三、对近代东亚的叙述

在韩国,高中国史教科书以及韩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史。19世纪以后,中日韩三国历史相互交织,几乎无法只根据一个国家的情况来叙述本国历史,然而教科书却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一历史现实。韩国签订《江华岛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壬午兵变时请求清朝派遣援军,韩国近代史由此拉开了帷幕。但对于日本和清朝出于何种“缘由”参与到韩国现代史中,书中却并未多做解释,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中日两国对韩国历史现实的应对情况。书中提到了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并未解释日本为何要将韩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对于中国满洲地区成为独立运动根据地,也没有解释为何能够在其他国家进行独立运动。历史书中只提到了日本的掠夺本性是实行殖民统治的原因,并通过殖民统治得以体现,只讲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以及韩国人民的反抗情况,似乎认为日本是一个强取豪夺的国家,对此不必过多了解。

在韩国现代史的叙述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中国则是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和支撑力量,而东亚历史则完全缺失,韩国近代史的叙述也别无二致。1945年后,中日韩(包括朝鲜)各国历史长期隔绝,时至今日,区域关系依然存在着断裂。而且美国深度介入东亚现实,相关叙述却极度缺乏,对韩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说明占据了大量篇幅。朝鲜战争是一场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战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世界史教学中均有提及,但韩国的历史书中却并未对各国的参战原因加以说明,对美国、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参战或介入原因惜字如金。近现代史不同于其他时期,需要结合中国和日本历史进行说明才能理清脉络。但是书中并没有这种问题意识,目前的历史教育中也不存在东亚这一观点。解读自身固然重要,但解读他人也可以成为回顾自身的依据。⁹

今后编写历史教材时应该加入对中日等东北亚周边国家的叙述,追求人类普世价值,朝着增进相互理解和互相合作的方向不断努力。

9 高英津,《韩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前近代日本》,《历史文化研究》第25辑,2006年。



中国国史(研究和教科书) 所阐述的东亚

——以 13 世纪以后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葛兆光 (复旦大学)

序言

对于东亚近世史特别是 13 世纪之后的东亚史，有一些事件相当重要。

其中，我想选择三个事件进行讨论。第一个是“蒙古袭来”（1274，1281），第二个是“应永之役”（1419），第三个是“壬辰丁酉之役”（1592，1597）。由于这三个事件都涉及东亚中日韩三国历史，所以，观察作为一国史的国史著作如何描述它们，从中也许可以看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区别，也可以发现，固执于各国立场的历史书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死角”和“盲点”。

下面，我选择在中国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史著作，以（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2）范文澜《中国通史》、（3）郭沫若《中国史纲》、（4）白寿彝《中国通史》为主，同时也参考大陆、台湾、香港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历史著作特别是通史教科书，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1、各国如何看待“蒙古袭来”

“蒙古袭来”（文永、弘安之役），在日本历史上当然是第一等的重大事件。川添昭二在《蒙古袭来研究史论》（雄山阁，1977）中指出，尽管这一入侵事件最终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征服和殖民结果，但是，它使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有一个巨大阴影。所以此后日本文献中反复出现有关的回忆、想象和描述¹。研究日本史的原胜郎、研究中国史的内藤湖南，这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也都认为，这一事件对于日本历

1 川添书指出，最早是在1293年前后，有《蒙古袭来绘词》（京都东山御文库藏，二卷）描述肥后国武士竹崎季长的武功（49页）；此后江户时代，有临济宗僧侣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1470年订补）的记载，有儒医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上中下三卷（有1688年自序）的记载，有津田元顾（？—1784）的《蒙古袭来记》及其养子津田元贯（1734—1815）的《参考蒙古入寇记》。以后，更有大量这类著作，有历史的，有文学的，如《元寇始末》、《蒙古寇记》、《蒙古诸军记辨疑》、《元寇记略》等等。

史很重要，因为从此日本以“神国”自居，有意识地发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并挣脱中国中心的“华夷秩序”。

而在高丽，蒙古这一因素，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历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蒙古控制高丽的时代，不仅蒙古人在侵略日本时，高丽是前沿基地，而且蒙古帝国四边扩张中，要不断向高丽征兵，要求高丽为蒙古提供女子，并把耽罗作为蒙古养马的基地，而高丽则从蒙古迎娶后妃，人们用蒙古名字，官吏结蒙古辫发，甚至蒙古统治使整个国家的政治和风俗，都出现严重的“胡化”²。因此在朝鲜史上，蒙古入侵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由于蒙古/元朝被视为“本国”历史，因此这些事件往往被纳入“中外关系史”。由于这是“本国”的历史，所以，虽然也说这是对邻国“侵略”，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会视蒙元为本国一个朝代，因而把蒙古与日本、高丽之间的这些事件，算在“中外关系”中，因而并不占历史的过多比重，一方面却又有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侵略事件算在“蒙古帝国”的身上，似乎是由于蒙古人试图建立欧亚大帝国，才有的扩张行为。

总的来说，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叙述中占的位置很边缘，基本上只是“中外关系”领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事件³，只有简单的过程叙述⁴，偶然有分析，甚至还出现过一些匪夷所思的说法⁵。

2、各国如何看待“应永之役”

所谓“应永外寇”(1419)是日本的说法。十四世纪下半叶，整个东亚政治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元明交替，蒙古帝国变成汉族王朝；高丽变成朝鲜，李成桂建立了新的朝鲜王朝并且得到大明帝国承认；日本的足利义满实现统一，结束了分裂状态，并且希望纳入明朝的朝贡体制。明朝初期特别是内部刚刚稳定的洪武朝，也确立了比较妥协和保守的国际策略，列出若干“不征之国”，从而使东亚三国构

2 所以宫崎市定说，“中世以后，朝鲜最外国化的时代就是这时（高丽忠烈王以后）了”，载宫崎市定《中国史》（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第三篇“近世史”之三“元”，237页；一直到辛禔王时代（1376，明朝已经建立八年），高丽仍用北元年号“宣光”，遣使赴元；同时当时的高丽，“城中人编发胡服者已多”，明朝要派使者来，使得高丽宪府急急忙忙禁止“胡服”，“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吴晗整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史料》第一册，76-79页。

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本，2006）下册449页，在谈到“元朝的对外关系”时，说“元世祖时曾多次用兵侵入邻近国家”，下面只有一句话“至元十一年（1274）、十八年两次出兵日本”。而《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3）虽然有400字左右的叙述，“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先后五次派遣使节去日本，劝喻日本来朝，日本政府拒绝答复”，但只是叙述两次战役的过程，并没有特别的分析；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下册中，几乎没有提到“东征日本”这一事件。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各种历史著作，如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的温海清著《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也对这个事件根本忽略。

4 倒是西方学者如卜正民在写元明历史的时候，特别注意到“蒙古袭来”这一事件的意义。见卜正民（Timothy Brook）：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如早期出版的一部有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南京：钟山书局，1933；商务印书馆，1946）第八章中居然说，经过这两次战役，“日人震蒙古兵威，嗣后襁祠无虚岁云”。116页。

成的“国际”开始一个新时代。

但是，永乐皇帝改变了洪武朝的保守策略，对安南用兵，对朝鲜施压。而李成桂与足利义满在 1408 年去世后，日朝双方政策也都有转变。继任的足利义持改变了其父之策略，他一反足利义满时代圆滑和妥协的外交方式，对朝鲜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⁶。但事与愿违，李朝太宗也是态度强硬的国王，1419 年反而出现了朝鲜向日本的对马岛入侵，即所谓“应永外寇”事件⁷，引起了日本朝野巨大震撼。日本有人甚至觉得，这一事件就如同当年“蒙古再袭”，真是巨大的危机。为了防止朝鲜与大明联手，致使日本两面受敌，因此，不能不重新调整日本的外交姿态⁸。这一年十二月，为了解决战争问题，日本派遣博多妙乐寺僧人无涯亮倪去朝鲜，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才算得到缓解。在我看来，这是东亚此后重建均衡国际格局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在日本与朝鲜两国的国史中，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这一巨变的背后隐隐约约是有明朝阴影的，毫无疑问，朝鲜出兵是得到明朝支持（至少是默许）的。当年，明太祖就向朝鲜说，朝鲜立国的关键，是对付倭寇（“打紧是倭子”），建议朝鲜一方面采取海疆坚壁清野（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一方面干脆派军队围困日本占据的附近岛屿（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⁹。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更改变明太祖的稳妥策略，对外逐渐强硬。由于收到朝鲜方面的屡次报告（“大修战舰，欲寇中国”），他对日本相当不满，甚至借口日本以朱元璋画像为箭靶，说出“发船万艘讨之”的威胁¹⁰。显然，朝鲜敢于主动出兵侵占对马岛，与同一年（1419）六月明朝总兵刘江在辽东望海碣全歼登陆的倭寇这一事件有一定呼应关系¹¹。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情况，才使得日本警觉这一事件背后的明朝因素。

可见，日本与朝鲜在应永之乱后的彼此妥协，确实是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明朝最终趋向平衡，形成新的东亚国际格局的一大事件，可是，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历史著作中，这一事件都没有记载¹²。那么，这一东亚史的大事件，为何在中国国史叙述中缺席？很值得思考。

6 如：对朝鲜不用“国王”名义而自称“征夷大将军”，国书上也只写“日本国源义持”，表示日本大将军与朝鲜国王为对等关系，指责朝鲜致日本的国书居然使用大明的“永乐”年号。因为足利义持认为，这是朝鲜以自贬为大明属国的方式，拖累日本也一起降格成为明朝属国。

7 此时，朝鲜太宗试图根本性解决倭寇问题，对日本的对马岛进行袭击，战争中，双方死伤 3800 人，迫使对马藩年幼的藩主贞盛求和，朝鲜强行把对马归并到庆尚道，还迁徙对马居民到巨济岛。

8 日本对于中国深有戒心，也许是仍然停留在“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中。李朝朝鲜的《世宗实录》卷十（世宗二年十月癸卯，1420）收录这次使团的通事尹仁甫《复命书》，其中记载：“臣等初到其国，待之甚薄，不许入国都。馆于深修庵。……继有僧惠珙来问曰：闻大明将伐日本，信否？答曰：不知也。珙曰：朝鲜与大明同心也，何故不知。先是，大明使宦者敕曰：若不臣服，与朝鲜讨之。继而使者畏害而逃，故疑而问之”。

9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一册，洪武二十年（1387），73-74页。

10 同上，第一册，永乐十一年（1413），255页；永乐十四年（1416），265页。

11 这一年（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与日本之间，也出现冲突。六月，“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以捕倭捷闻”，明朝军队与倭寇在望海碣发生战斗，“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三，2141-2143页。又，可以参看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的“日本”部分。

12 无论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的著作皆然。大多数中国通史著作，都忽略这一事件。

3、各国如何看待“壬辰丁酉之役”

“壬辰之役 / 文禄之役”（1592）和后来的“丁酉之役 / 庆长之役”（1597），比起主要发生在蒙古、日鲜那两件事情来，由于东亚中日韩三国都直接卷入，战争一连数年，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大，更牵动各国的政局，因此，在三国的历史书写上，都留下了很多记载。

不过，各国的记载也许有不同。在中国历史著作中¹³，把丰臣秀吉出兵，看做野心膨胀之后，试图建立东亚大帝国的一种“侵略”，这一点，在朝鲜和中国的历史书中，当然没有问题，日本方面也并不否认“侵略”。但在描述战争过程时，各自依据的是己方的记载，站在各自立场，对同样的一个“壬辰之役”，这些记载往往不同。比如，日本方面对于壬辰之役，会凸显明朝的妥协和日本的强硬，日本提出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1）明朝皇帝女儿与天皇联姻，即类似“和亲”，（2）明朝向日本开放勘合贸易，（3）割让朝鲜南部¹⁴。当时，只是由于急于讲和的小西行长没有正确传达这些意思，所以，导致 1596 年明朝使者派遣使者来，居高临下地册封“日本国王”，允许对明朝贡。这才引起丰臣秀吉大怒，发生第二次（1597-1598）战争¹⁵；而中国方面的记载，则完全没有这些内容，相反，中国通史著作中只是强调丰臣秀吉在壬辰之役失败后，“野心不死，为了准备卷土重来，乃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退兵，以便展开新的进攻”，而明朝官员主张妥协，“堕入丰臣秀吉的阴谋之中，陷于被动地位”¹⁶。

很明显，现代的一国历史著作，会为了（国家）自尊，强调各自希望强调的一面。就像中国的历史著作，就一方面会强调中国的支援对于挽救朝鲜命运的重要性，一方面会夸大明朝援军（包括朝鲜）对日本的胜利。

13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 531-532 页，对此有近千字记载，但主要说的是（1）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进一步侵略中国，（2）1593 年打败日军最精锐的小西行长军队，收复平壤与开城，日军退守釜山，（3）石星妥协求和平，1597 年日军再度入侵，（4）丰臣秀吉死，日军于朝鲜南海被灭，战争胜利。结论是“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朝鲜人民的坚持抗战，而明军的两次援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532 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六册，572-578 页。主要根据吴晗《史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中朝文献，对整个过程做了更加详细的记录，对于第一次援助朝鲜，与翦伯赞书不同的是，承认只是“形成对峙局面”。但是此书基本不用日本史料，偶尔使用日本方面的论著如林泰辅《朝鲜通史》，还误以为林为朝鲜人。

14 这一点在历史资料中就已经有差异了。如万历二十四年（日本庆长元年，1596），明朝派正使杨方亭、副使沈惟敬，赴日本大阪见到丰臣秀吉，据日本文献记载，丰臣秀吉曾经提出“七条”苛刻要求。但在明朝记载中，却似乎是日本求和，明朝居高临下，让日本从釜山退兵，不得再侵略朝鲜，册封日本国王之后，再谈互市问题，对照之下，与丰臣秀吉的“七条”差别太大。以上可参考《明神宗实录》、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等。

15 参看佐藤信等《（改订版）详说日本史研究》（山川出版社，2012），234 页。

16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552 页。

4、以东亚史的视野看待三个事件

如果我们超越王朝的立场，采取东亚史的视野，从东北亚整体的角度去重新看以上三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说，蒙元入侵日本（以及将高丽作为“属国”），不仅引起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在文化上激活了各国的自我意识，使得东亚不再延续“以中国为中心”，逐渐改变政治上的朝贡或册封体制、文化上向汉唐宋中国学习和模仿的风气，开始出现政治上的自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上的独立意识；“应永之役”的发生以及解决，说明三国之间的彼此平衡，奠定了东亚三国此后数百年的稳定状态，此后，以朝鲜的“事大交邻”为轴心，一方面明鲜之间通过“朝天”维持朝贡体系的延续，一方面日鲜之间通过“通信”维持对等的国家外交。加上海陆两方面的往来贸易，明清中国、李朝朝鲜、藩府日本之间，除了丰臣秀吉那一段时间外，大体维持着较长时间的稳定，建立了东亚国际秩序。而“壬辰之役”的发生，则使得这种稳定的国际关系，受到激烈的震荡，也埋下日后东亚政治与文化认同崩溃的伏笔，不过，在当时它很快就平息，东亚世界又回到“庆长之役”后建立的格局中。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西方坚船利炮进来。

可是，如果历史学家只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视野只是限制在现代国家的国界之内，不考虑整个区域的互动与联系。那么，就像一开始我所说的，历史就会留下一些“死角”和“盲点”。在中国史著作中，蒙元入侵日本和控制高丽，是蒙古人的世界野心，朝鲜侵占对马，也只是邻国之间的纠纷，至于壬辰之役，中国是朝鲜的国际主义朋友，两国一起战胜了日本侵略军。可是，如果把这些话题放在东亚史里面看呢？

从东亚史与国别史的差异中，让我们看到，历史书写，如果只有一个圆心（国家）的历史叙述，始终会使得历史书写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当历史仅仅聚焦中心，边缘总是会被舍弃；可是，如果有若干个圆心，划出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的彼此交错，就会有很多重叠，东亚史也许就是几个历史圈的交叉处。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也提倡“从周边看日本”、“从周边看韩国”、“从周边看蒙古”，希望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重新观看历史，也许，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我认为，一个历史学者，既要学会回到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去想象历史，也要学会超越国界（现代国家的国界只是后来形成的）去看更大的历史。如果只是站在今天的国家边界，逆向回溯古代彼此交错的历史，很容易形成固定的“中心-边缘”历史构图，因而忽略“边缘”的存在，忽视这些“边缘”在当时可能就是“中心”，这样容易因为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差异，形成历史评价的偏颇。

2016年7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报告 3



日本国史(研究和教科书) 所阐述的东亚

三谷 博 (迹見学园女子大学)

前言

在日本,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育,都将历史分为日本史与外国史两部分,这一点对现代日本人的世界观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认为“日本处于世界(亚洲)之外”,将日本看作是亚洲等世界其他地区都不同的国家。

笔者以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依然持有这样的世界观是不恰当的。近些年来,笔者也在日本学术会议的史学委员会中提议高中历史教学应当开设一门将日本史与世界史合二为一的“历史基础”科。目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参考这类提议,正在研究下期学习指导要领,拟在类似的体系下开设一门“历史综合”的必修课。

在此,笔者以几本主要的教科书为素材进行分析,把握现行日本历史教育如何教授日本以外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东亚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思考未来理想的日本历史研究与教育应是怎样的。

1. 高中教科书中的世界与东亚

在日本的高中教育里,日本史和世界史被拆分成不同的两门科目,学生也不一定同时修习两门课程。虽说规定世界史是必修课,修日本史的学生一定也修过世界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全力应对大学入学考试的学校有的并不教授世界史。考生如若报考国立大学,必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其中“历史地理”的三门科目中,报考日本史的考生最多,其次为地理,世界史最少。因此,很有可能有不少高中生根本就不学世界史,或者学过就忘,毕业时全都还给老师了,这一点很让人忧虑。

那么,今天大多数考生所学的日本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记述世界与东亚的呢?是将日本历史与日本以外的世界历史完全一分为二的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三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来对此进行分析。

1) 山川出版社《详说日本史B》2015年

这本书是日本销量最好的教科书,现今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六成。因此,它应

该会对今后日本人历史观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介绍统计结果之前，先简单说明一下日本史教科书中的时代划分。时代划分采用四分法，将日本历史划分为“原始与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与现代”的四个时期。正因为是教科书，这种分法是遵循了文部科学省所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的，不过其实日本学界长期以来也使用这种四分法。西方一般采用三分法，将历史分成“古代”“现代”和“中世”，日本的四分法是基于日本的具体情况，在三分法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时期。

日本史的“近代与现代”，指的是通过与西方密切交流进入“近代化”的时期。从时间段上来看，它相当于中国的“近代”“古代”二分法中的“近代”。另一方面，日本史中的“古代”，可以说是日本建构“古典文明”的时期。从3世纪国家形成开始，8世纪建立律令制国家后达到一个鼎盛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到新罗时代。

处于“近代”与“古代”之间的是“中世”与“近世”这两个时期。学界一般认为17世纪初德川政权的建立是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中世”后期战乱结束，日本国内重新统一之后便迎来了持续两百年以上的和平时期，这便是“近世”。这本教科书也是按照这一体系写成的。但是学界在对“中世”、“近世”与其他时期的关系的认识上并不稳定。在“近世”末期曾经认为这两个时期都是武士统治，有一定的连续性，这种观点在从西方引进“封建制”概念时也沿袭了下来。与此相对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受美国学者的启发产生的，这种观点将“近世”区别于“中世”，并将它看作是“近代”形成的前夜。另外还有人提出日本“近代化”的萌芽早在与西方接触之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已经产生了。这种说法很受欢迎，同样倾向的观点后来在中韩两国也都出现了。不过日本的教科书对这类意识形态性的历史解释并未深入触及，而是以超越立场的四分法为基础，只记述事实。

那么，《详说日本史B》是如何记述日本以外的世界及其与日本的关系的呢？在附表1、2中，我大概统计了书中关于日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记述所占行数。时代划分按照本书的章节结构，日本的外部世界大体上分为世界整体、东亚（包括印度）、东亚以外（西方等）的三部分，笔者尝试对其记述量进行了比较。

这本教科书中关于日本外部世界的记述，平均每页有7.5行。每页的总行数约为29行，也就是说约有四分之一都是在记述日本与世界的关系。记述量之多，让人感到很意外。

观察每个时期的章节中每页对外部世界的记述量，可以看出“近代·现代”及“原始·古代”时期较多，中世时期记述较少。近世一向被看作是“锁国”时期，这一时期却详细记述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点同样让人感到意外。其原因将在下面进行分析。

接下来再来看各个时期最受重视的事件和地区。首先，“原始·古代”期重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与东亚整体及印度的关系等。原始时期关注的内容包括：基于考古学知识了解到的日本与欧亚大陆东端的一体性及特异性；国家形成时期对中国史书史料的援引；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佛教；以及通过向中国派遣使节所输入的律令制等诸多制度及文化。

日本的“中世”始于12世纪，新建的武士政权与自古延续下来的京都贵族政权同时并存，最终演化为地方武士群雄割据的局面。时间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宋朝

表 1 山川版 各地区的相关记述行数 (图表也换算成行。专栏及注释以行数计算)

列 1	世界全体	东亚印度	东亚以外 (含西方)	合计 (A)	页数 (B)
序言·特设页概况	5	9.5	0	14.5	4
第一部分 原始·古代	22	300	0	322	79
第二部分 中世	27	207	4	238	70
第三部分 近世	18	271	359	648	94
第四部分 近代·现代	390	669	808	1867	167
合计	462	1456.5	1171	3089.5	414

表 2 山川版 平均每页的记述行数 (A/B)

列 1	世界全体	东亚印度	东亚以外 (含西方)	合计 (A)
序言·特设页概况	3.6	2.4	0.0	3.6
第一部分 原始·古代	4.1	3.8	0.0	4.1
第二部分 中世	2.8	3.0	0.1	3.4
第三部分 近世	6.0	2.9	3.8	6.9
第四部分 近代·现代	2.3	4.0	4.8	10.9
合计	7.0	3.5	2.8	7.5

至元、明两朝，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至朝鲜王朝初期。这一时期对于外部世界的记述相对较少，有限的记述为与宋朝的贸易往来、禅文化的输入、蒙古来袭、以及所谓“倭寇”等历史。关于“倭寇”，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其后期的主要成员并不是日本人。另外，“中世”部分还记述了其并入“日本”的周边地区，如琉球王国的形成、虾夷地·库页岛上各民族的情况等。

日本史的“近世”一般认为是由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名霸主所建构，教科书中也沿用了这一定论。尽管这一时期多被认定为“锁国”时代，这本教科书中对外部世界的记述竟然高达平均每页七行，所参照的也更多是东亚以外的区域。分析其原因，由表 3 可见，近世的三章内容中，第一章和第三章都详述了日本与西方的关系。记述 16-17 世纪的章节中有大量关于天主教的内容；记述 19 世纪前半期的章节中又花费大量篇幅叙述了对西方国家海上入侵的防卫及洋学的普及。相比之下，二者中间记述 18 世纪的章节中，对外部世界的记述则较少，仅限于与日本存在外交关系的朝鲜以及汉学等内容，这一章的记述可以印证这一时期传统的“锁国”形象。

关于“近代·现代”部分，涵盖了 19 世纪中叶对西方实行开国以及明治维新，直至今天的全部内容。这一部分总称为“近代·现代”，具体五个章节中并未明确区分是“近代”还是“现代”。这也许是因为执笔人考虑到“近代”与“现代”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至今尚无定论吧。其实学界也有各种不同观点，例如战后曾经将俄国革命作为“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后来又认为分水岭应该是大日本帝国的毁灭，如今又有人提出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亦或是冷战结束。

“近代·现代”部分中关于外部世界的记述每页平均 11 行，占一页的 38%。在世界整体、东亚及东亚以外的三者中，记述最多的是东亚以外。但有意思的是，

各个章节中三者所占比重并不一样。如表 3 所示，“近代国家的成立”一章中没有出现对世界整体的叙述，对东亚以外的叙述则多于东亚。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近代始于美国要求下的开国，明治维新中的改革也多是在西方化的进程中完成的。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在东亚以外的记述中，欧洲的记述量要高于美俄等国。同时，从对单个国家的提及度来看，朝鲜及中国最高。提及中国是在记述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时，提及朝鲜则更多是在国家关系的记述中。这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对朝关系是日本外交中最为紧迫的课题，从两国外交关系的新变化直至日韩合并。接下来的一章题为“两次世界大战与东亚”，对东亚关系的记述自然很多，是东亚以外的 1.4 倍。单个国家中与中国关系的记述最多，反映了教科书对日中战争最终爆发之前酝酿过程的重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的章节相比，对世界整体的记述大幅增多。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会议之后，日本加入了世界各大公约组织。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教科书以这种形式表述日本已经成为了“列强”的一员，当然书中并没有对成为大国的夸耀之词。关于东亚以外，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不仅是因为日美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大获全胜，其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政治的主宰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被占领下的日本”一章，关于美国的记述远超于其他国家，对脱离日本统治而独立的韩国·朝鲜以及中国的记述则很少。这也许是因为日本被占领时期，与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外交关系，经济上除了朝鲜战争中的特需之外也并没有什么联系。下一章“高速发展的时代”也同样，除了关于与中韩两国恢复邦交的记述以外，关于两国的其他记述都很少。此外，还有一点耐人寻味，那就是欧洲自此只出现在“世界整体”的叙述中，其它部分则不再出现。最后一章“剧烈变动的世界与日本”与其他章节不同，对各地区情况的说明要多于对各国间关系的记述。其中，对中国的提及较多，中东地区则首次出现。

以上对这本教科书中所关注的世界各地进行了一个整体观察。总结一下对东亚地区的关注情况，可以说在原始·古代及中世部分中，东亚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全部。近世之后，开始出现对东亚以外地区的记述，记述量甚至超过东亚，这一点让人感到意外。再看东亚内部的记述比重，在原始·古代时期，包含印度在内的亚洲整体及关于中国的记述占绝对比重，与之相比，对朝鲜半岛的提及主要出现在对东亚整体概况的说明中，整个时期来看，对其记述出乎意料地偏少。

下面再来看看这本教科书在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所重视的领域。由表 4-a·b 可见，在原始·古代时期，文化迁移的记述占一半以上，这自然是因为古代文化·制度都是从中国·印度·朝鲜传入的。日本古代初期政权曾经入侵朝鲜半岛，但当时还没有文字，因此相关记述的史料来自于考古学调查，或是援引中国各朝代的正史。中世时期较多提及贸易与国家外交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另外，每个时期都有很多包括战争在内的外交领域的记述，特别是近代·现代时期占四分之三左右。如前所述，即使是在近世这个公认的“锁国”时代，也有一半以上是外交方面的记述。单看有关战争的记述的话，占总体的五分之一，主要内容是中世的蒙古来袭以及近代·现代战争，原始·古代时期及近世则非常之少。可以说，日本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这本教科书中以这样的形式反映出来。

表 3 《山川详说日本史(2015)》中提及的行数(图版也计入行数,专栏和注释虽然字较小,也按行数来计)

列 1	全世界	东亚 / 印度	朝鲜	中国	台湾	东南亚	琉球
序言	5						
特设页(大佛造立)		6	3.5				
第一部分 原始·古代	22						
第一章 日本文化的黎明		92	3	27			
第二章 律令国家的形成		68	22	88			
第三章 贵族政治与国风文化							
小计	22	160	25	115	0	0	0
第二部分 中世	27						
第四章 中世社会的形成		23		18			7
第五章 武家社会的成长		30	20	76			7
小计	27	53	20	94	0	0	14
第三部分 近世	18	4					
第六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		40	76	15		14	12
第七章 幕藩体制的发展		9	8	39	2		
第八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				40			
小计	18	53	84	94	2	14	12
第四部分 近代·现代	28						
第九章 近代国家的成立		24	106	109	11		15
第十章 二次世界大战与亚洲	178		26	207		34	
第十一章 占领下的日本	93		20	4		12	
第十二章 经济高速增长时代	38	4	12	3		5	14
第十三章 急剧变化的世界与日本	36	14		15		9	
小计	373	42	164	338	11	60	29
合计	445	314	296.5	641	13	74	55

表 4-a 山川版 各领域相关内容行数

列 1	史料	文化传播	贸易	外交·战争	战争(内部)	合计
第 I 部 原始·古代	60	211	18	51	14	340
第 II 部 中世	4	37	58	79	40	178
第 III 部 近世		192	78	308	24	578
第 IV 部 近代·现代		218	305	1417	503	1940
总计	64	667.5	459	1855	581	3036

表 4-b 山川版 各领域内容占比

列 1	史料	文化传播	贸易	外交·战争	战争(内部)	合计
第一部分 原始·古代	18%	62%	5%	15%	4%	100%
第二部分 中世	2%	21%	33%	44%	22%	100%
第三部分 近世	0%	33%	13%	53%	4%	100%
第四部分 近代·现代	0%	11%	16%	73%	26%	100%
合计	2%	22%	15%	61%	19%	100%

	蝦夷地・库页岛	东亚小计	中东	欧洲	俄罗斯	美洲	其他	东亚以外地区小计	世界合计
		0						0	5
		9.5						0	9.5
		0						0	22
		122						0	122
		178						0	178
		0						0	0
	0	300	0	0	0	0	0	0	322
		0						0	27
	9	57						0	57
	17	150		4				4	154
	26	207	0	4	0	0	0	4	238
		4						0	22
	12	169		201				201	370
		58						0	58
		40		118	40			158	198
	12	271	0	319	40	0	0	359	648
		0						0	28
	10	275		253	52	57		362	637
		267		89	33	113		235	680
		36				101		101	230
		38			7	38		45	121
		38	35		18	12		65	139
	10	654	35	342	110	321	0	808	1835
	48	1441.5	35	665	150	321	0	1171	3057.5

2) 其他教科书：东京书籍、清水书院

其他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东京书籍和清水书院进行比较时，不能忽略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主要选择两本，一本是东京书籍出版社的《新选 日本史 B》2014 版，该书拥有第二的市场份额，另一本是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 日本史 B》2016 年版。这两本书和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 B》都是按照文科省的学习指导纲要来编撰，所以大体章节构成十分相近，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关于“近代”和“现代”的划分，有明显不同。山川版中未划分“近代”和“现代”，而其余两版，以 1945 年为界划分“近代”和“现代”。但山川版将这段时期明确划分为帝国主义时期和战后社会崩坏时期，因此在内容上和其他两版没有实质差别。日本一直十分重视“战前”和“战后”的划分，因此在编撰教科书时也都遵守该原则。至 2016 年，“战前”和“战后”各有 70 余年，二者的时间长度几乎相同。

这三本教科书在对待国外，特别是东亚的内容上，有何不同呢？以下就山川版中的“近世”内容进行讨论。对比表 5-a, 5-b 和 5-c 可以得知，就近世而言，

东书版中国外相关内容比山川版少，反而是清水版中国外内容较多。三者中东书版的国外相关内容最少，但平均每页也有 6 行以上的相关记述，可见不止山川版教科书有关注国外历史的趋势。

表 5-a 山川版 近世历史中各地区占比

列 1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三部分 近世	82%	18%	0%	100%
第六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	0%	46%	54%	100%
第七章 幕藩体制的发展	0%	100%	0%	100%
第八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	0%	20%	80%	100%
小计	3%	42%	55%	100%

表 5-b 东书版 近世各地域相关内容占比

第三章 近世社会的形成与平民文化的发展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一章 接触欧洲文化与国内统一	27%	26%	47%	100%
第二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	0%	41%	59%	100%
第三章 近世社会的高度发展与町人文化	16%	84%	0%	100%
第四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平民文化的高度发展	0%	8%	92%	100%
小计	11%	36%	53%	100%

表 5-c 清水版 各地区相关内容占比

第三部分 近世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一章 从中世到近世	11%	55%	34%	100%
第二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与国际关系	0%	71%	29%	100%
第三章 幕藩体制的发展与元禄文化	16%	84%	0%	100%
第四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化政文化	6%	15%	78%	100%
小计	6%	62%	32%	100%

就各地域内容的比例平衡而言，山川版和东书版中关于东亚以外地区的记述多于东亚的记述，而清水版则相反，关于东亚的记述多于东亚以外地区的记述。依据表 6 中每页相关内容所占行数，也可以得出相同结果。可见，即使遵守相同的指导纲要，根据教科书不同，所作历史的解释也不同。

其中原因和编者不无关系。清水版中，近世部分主要由中世末期到近世初期的国际关系史专家荒野泰典所著。荒野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专注于该领域的研究，并致力于改变相关历史解释。“战后”关于近世初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都在于与西方的关系等方面，如与天主教的关系等，并强调对西方的闭关锁国。而荒野先生更关注日本和近邻的朝鲜，中国，琉球，北海道，东南亚等的关系，证实天主教被禁后，日本依然和这些国家保持往来，并提倡日本应该使用东亚通用的国际关系名词“海禁”来取代“锁国”。如今荒野和其合作学者提倡的“四个入口”等近世日本的历史解释已被认为学界通说。

清水版是对荒野先生的历史解释的扩展，笔者认为近世初期的内容中，东亚和东亚以外地区等相关记述的比例是合理的。山川版和东书版认为在近世初期，“战后”被美国占领期间，形成西方是压倒性的存在的印象，而该印象一直没有改变。可依照现今学界的常识来判断，该看法已落后于时代。同时清水版中，关于国际关系记述和国内记述的比例略有失衡。同时，就近世中期和后期而言，三家出版社的内容安排相似。近世中期的相关内容中，关于国外的描述较少，并未提及欧洲，但

表 6-a 山川版 近世平均每页各内容的行数

列 1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三部分 近世	18.0	4.0	0.0	22.0
第六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	0.0	3.9	4.7	8.6
第七章 幕藩体制的发展	0.0	3.9	0.0	3.9
第八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	0.0	1.0	3.8	4.7
小計	0.2	2.7	3.6	6.4

表 6-b 东书版 近世 平均每页相关内容所占行数

第三章 近世社会的形成与平民文化的发展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一章 接触欧洲文化与国内统一	4.6	4.4	8.0	17.0
第二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	0.0	3.4	4.9	8.3
第三章 近世社会的高度发展与町人文化	0.3	1.6	0.0	1.9
第四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平民文化的高度发展	0.0	0.5	5.2	5.7
小計	0.7	2.2	3.2	6.1

表 6-c 清水版 平均每页各地区所占行数

第三部分 近世	全世界	东亚	东亚以外地区	世界合计
第一章 从中世到近世	2.1	10.3	6.3	18.6
第二章 幕藩体制的成立与国际关系	0.0	11.9	4.8	16.7
第三章 幕藩体制的发展与元禄文化	0.2	1.2	0.0	1.5
第四章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化政文化	0.4	1.1	5.4	6.9
小計	0.5	5.1	2.6	8.2

提及了汉学的普及。该做法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但学界最新观点认为，汉学的普及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其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前提。因此迟早需要修改这部分内容。三家出版社都增加了 18 世纪末以后关于西方的内容，而减少了东亚的内容。笔者认为，考虑到明治维新，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急剧西化的事实，该做法十分合理。

现在无法对近世历史之外的内容进行定量分析，按大体印象，三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对近世内容的编排做法相似。东书出版社主要关心日本国内，而清水则以东亚，北海道，满洲移民冲绳等地的地方史和女性社会史为主题设有专栏，可见其比山川版更关注国外动向。

2. 日本史的研究动向

与中国和韩国两国不同，日本高中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由大学老师执笔。中国中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大学老师无关，而韩国则由中学老师参与其教科书的编写。日本和中韩两国的教科书编者与其政府的关系也不相同。日本在编撰教科书时，虽然需要遵守学习指导纲要，但是在具体内容上，仍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清水版教科书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意味着日本教科书的内容和学界的研究动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尽管是日本国史，但是关于国外的记述也占很大的比重。山川版的序言有如下一段话。“日本史的作用是探索日本列岛上的人们的发展进程。而这发展进程在各种地域交流中，受日本史的影响的同时，又构成日本史的新篇章。因此，我们学习日本史时，需要了解当时周边国家的历史以及日本同各国的关系。”

通过日本在世界的地位以及日本和邻国的关系来重新定位日本史这一做法近年

来已成为学界的流行。但是就古代史而言，这是早前留下的传统。古代日本通过引入律令制度，构建国家框架，正是因为这样，现今要通过参考日本律令的注释书籍来复原唐律令。笔者和同代学者也就是之前提及的荒野泰典和村井章介等人最先开始提倡要对中世和近世历史进行重新定位。村井章介是中世后期的专家，他通过研究证明倭寇是横跨日本朝鲜和大明等国家的海民集团，并揭示了当时的东亚除了近代的国家本位制度存在其他原理和制度。而且，笔者作为 19 世界中叶的日本史的专家，编撰了大学教科书《成人版近代史 19 世纪》（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9 年），该书面向成年读者，介绍了近世到 19 世纪末的东亚整体的情况，比如随着俄罗斯，英国，美国的登场，日本，朝鲜，清朝，琉球等传统社会将如何变化，以及国家间相互关系将如何变化等。以往的近代史是从日本国内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而本书不仅从日本国内视点，更从朝鲜和中国等外部观点来理解当时的国际关系，这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过去数十年间，日本史学界流行起“发现东亚”的学术风潮，颠覆以往“孤立的日本”等印象。而该趋势也在高中的日本史教科书得以体现。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领地，殖民地，冲绳，北海道等边际领域，以及在这些地方往来的人们的实证研究才刚起步，新一代的研究者们正在不懈努力（比如盐出浩之《越境者的政治史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日本移民和殖民》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5 年等）。通过这样的努力，日本通史迟早会拥有更广阔的视点。

结语

现在是决定在日本史的学界和教育界中应该如何定位日本与外界关系的关键时刻。在学界，与对近代历史研究不同，对中世和近世的研究已走下坡路的趋势。而最近日本和中韩等邻国的关系恶化，这让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等相关研究陷入僵局。年轻学者越来越关注国内，这可能导致相关研究陷入只关注国内和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僵局。

在教育界，高中的新增科目“综合历史”能否取得成功尤为重要。为使下一代全球化竞争中胜出，文部省决定结合近现代的日本史和世界史，设计“综合历史”这一科目，但学界和教育界是否愿意为此共同努力尚未可知。虽说是全球化，如何平衡有关东亚和欧美内容的比例还是难题。要顶住内外的政治压力，得出有长远意义的解决方案，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这就是如今面临的局势。



民族国家与近代东亚

八百启介（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序言

我是八百启介，来自本地的北九州市立大学的文学部。这次很荣幸受彭教授邀请，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非常感谢。

我的专业并不仅限于东亚，但这几年来，我感到我们可能正束缚着 21 世纪东亚年轻人的未来，因此有必要在大学里加深与中国、韩国之间的交流，特别是现在我也在推进与韩国仁川博物馆的合作项目。

1. 成为民族国家以前的东亚

今天听了刘教授的引言，以及葛教授、赵教授和三谷教授三位的报告，我感到对于如何看待近代这一问题，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幻灯片 1）。中国受到了鸦片战争的影响，日本则是受到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黑船事件的影响，刚才三谷教授以教科书为例进行了说明，认为近代必须以日本与欧美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思考。而赵教授则指出韩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即由于没有直接经历鸦片战争和黑船事件，日本、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出来。而我个人是同意赵教授的观点，认为日本的教科书也应该以东亚为中心，重新审视历史。

我的研究领域是日本近世时期以及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从研究近世的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会产生疑问，日本进入近代真的算是历史的进步吗？我认为，近代这个词换言之可以称作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民族国家这种叫法的确会产生一种国民团结一致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种优点，但建立民族国家同时也孕育着在外树敌的问题（幻灯片 2）。

而在谈到东亚的民族国家时，中国、韩国与日本相比，在起点上存在巨大差异。日本是从黑船事件和明治维新开始，自然而然教科书也非常重视这两大历史事件。与此相对，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则是从抗日运动开始。我们日本人无法正确地区分“抗日”和“反日”这两个词。（而要研究东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须从区分这两个词开始。我认为有必要全面地认识到如今的中国、韩国是从抗日

运动开始这一事实。

幻灯片 1

论点整理・・・中、韩、日的不同点

引言(刘杰: 基调报告)

- 跨越国境的“学知的共同体”
- 能否书写东亚共通的“历史”? 验证其可能性

葛兆光老师的报告

- 在西方人进入东方以前, 东亚国际秩序基本保持稳定。
- 19世纪西方各国凭借武力进入东方, 在东亚建立了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

赵琰老师的报告

- 所谓东亚的观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常见・・・近现代史和其他时期相比, 和中国历史、日本历史联系起来说明更容易理解。

三谷老师的报告

- 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外界・・・18纪末以后, 关于西方的记述增加, 关于东亚的笔墨减少
- 从明治维新之后快速地进行西方化这一事实来看是妥当的



近代的东亚优先与欧美之间的关系(葛老师和三谷老师的报告)

重视近代史上从东亚整体出发的视点(赵老师的报告)

幻灯片 2

民族国家与近代东亚

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内”、“外”两种意识, “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

利・・・营造出国团结一致的氛围

弊・・・树立“外”敌、确定领土→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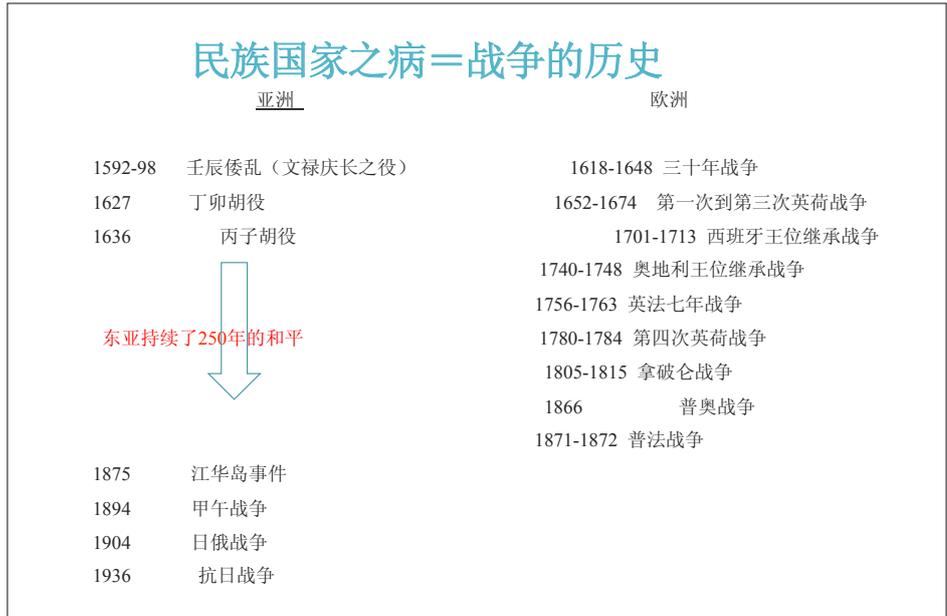
东亚的民族国家・・・出发点的不同 ⇔ 看起来相同的“儒教的近代”

[日本=始于明治维新、黑船事件	教科书重视欧美	修改条约→日俄战争
		亚洲视点非常重要	江华岛事件→韩国合并→日中战争
	中国、韩国=始于抗日运动	“抗日”不是“反日”	

※对欧洲学者来说, “国别史”的写作可能与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 通过历史撰写来塑造国家认同有关。国别史的写作无疑是在肯定殖民时期的“国家”。(葛兆光“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 羽田正编《全球史与东亚史》2016)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上述民族国家到底有多大效果。关于这一点, 刚刚葛教授和三谷教授的报告中都涉及, 江户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时代。对于近代以后的日本, 很多人对江户时代持负面评价, 认为闭关锁国导致日本陷入停滞,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予一个更加积极的评价。在江户时代, 欧洲战火连绵, 欧美各国为了建立民族国家, 终日战争不休。而在亚洲各国引入民族国家以前, 持续了一段非常和平的时代(幻灯片3)。我想在本次论坛上各位都对这个观点有了一个认识, 希望之后能把这个观点普及给更多的一般民众。这绝非停滞, 而是东亚的英明与智慧。我们作为研究人员, 有义务重新学习前人的智慧、重新开展研究、传达给普通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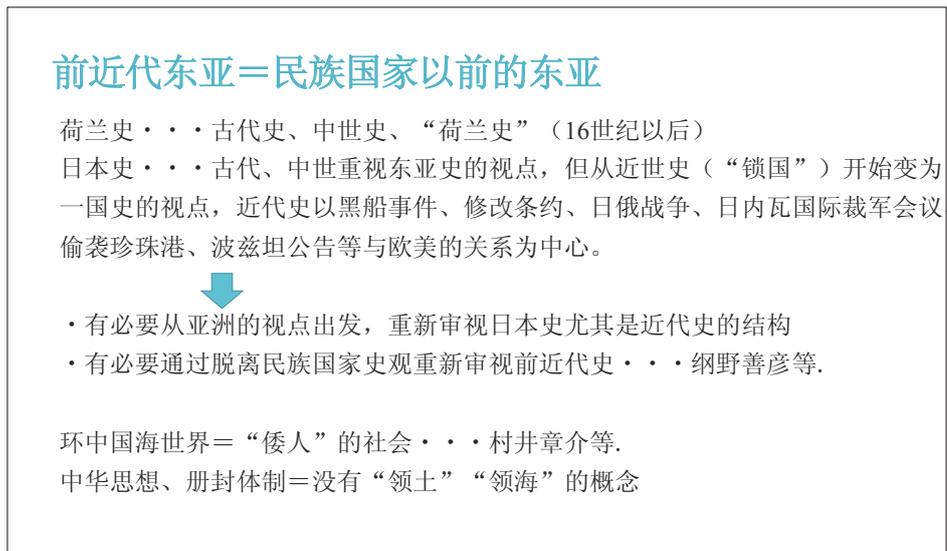
幻灯片 3



2. 从东亚视点出发重新进行审视

我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在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与荷兰的关系为中心展开的。荷兰也有自己的荷兰史，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幻灯片 4）。荷兰作为近代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是在 16 世纪，之前的历史是称为古代史和中世史，相当于东亚史之于日本，即作为欧洲整体的当地历史学习。在日本史中，古代和中世都是以东亚的视点出发进行描述的，而从近世史开始转换为一国史的视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更加明确地采用东亚的视点。

幻灯片 4



(1) 何为国风文化

刘教授在会议开始的主旨演讲里主张有必要进行对话，重燃行将熄灭的火苗。我想，为此有必要向一般民众宣传，从东亚视点考虑可以了解到这样的历史，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优点。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历史中，到底应该谈哪些内容，能够了解哪些东西。通过有效地传达这一点，可以与更多的人共有东亚这一认识。

比如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讲到的国风文化，以往都是解释为，遣唐使被废止后，日本与中国的联系中断，日本独有的文化由此诞生。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幻灯片 5）。的确遣唐使这一政治、外交联系中断了，但有大量船只从中国来到日本，贸易得到发展，这就是宋钱经济圈逐渐形成的过程。我想在这方面桥本教授是专家。也就是说由于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往来频繁，不再需要遣唐使，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国风文化。通过引入经济这一视点，我们对国风文化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将来也会同样从其他视点来重新审视日本的历史、东亚的历史。

幻灯片 5

从东亚视点出发重新审视① ··· 何为“国风文化”？

《以往的学说》

由于遣唐使被废止（**政治事件**）脱离唐朝的影响进行日本化

《最近的研究》

在消化、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日本本土的（日本风格）文化

《实态》

9世纪的对外关系

907年 唐朝灭亡

开始有唐朝商人、新罗商人来到博多 ··· 宋钱经济圈的形成

838年 最后的遣唐使

894年 菅原道真提议废除



国风文化

(2) 壬辰倭乱的意义

比如说赵教授提到的壬辰倭乱也是一个例子。这（壬辰倭乱）是丰臣秀吉的命令，但丰臣秀吉认为如果自己率领的日本军队不在朝鲜粗暴动武，朝鲜的民众会支持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丰臣秀吉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在实施对外侵略。

刚刚三谷先生说有必要重新检讨日本的国民性，但提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本质（nature of nation），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的历史是从明治维新、黑船事件开始的，再往古代追溯的话，可以说是起自邪马台王权征服周边其他民族（幻灯片 6）。因此，现在日本的国家系统，既有作为民族国家从黑船事件以来重视美国的性质，又包涵了古代邪马台王权征服同化周边不同民族的过程。

丰臣秀吉引发的壬辰倭乱、朝鲜侵略战争意义重大，其一在于侵略意识的欠缺在近代得到继承。在幻灯片右下角负重的朝鲜人的照片象征着日俄战争的意义。这里展现出来的样貌和司马辽太郎所描写的日俄战争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幅照片看到不同的真实，即日本是由于朝鲜民众承担的负担而与俄国交战。

另一点在于，在壬辰倭乱中，九州的农民被带到朝鲜半岛去搬运货物。这样一

幻灯片 6

从东亚视点出发重新审视② ··· 壬辰倭乱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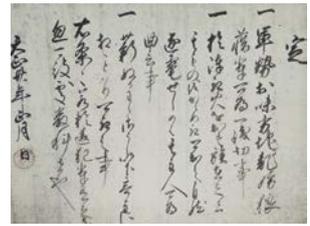
1. 古代邪马台王权建立后通过“征服”形成国家

欠缺“侵略”意识

“假道入明”《被近代继承》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朝鲜民众的负担

作为“事变”的大陆的战争



2. 周边领域的权力和民众的关系

- 从九州农村抓壮丁、增加朝鲜被俘虏人质劳役负担
- 作为反丰臣领主层的降倭
- 东亚义兵运动的意义



前近代的战争与近代战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来，九州农村的劳动力不足。为此从朝鲜绑架平民，让他们在农村干活。这也和太平洋战争中使用的征用工和慰安妇等近代问题存在联系。从这个意义来看，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认为壬辰倭乱至今仍未结束。此外，被称为“降倭”的在朝日本武士带有反对丰臣秀吉领主层的性质，也就是说，把这场前近代的战争当作是现在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战争是不合理的。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刚刚赵教授提到的高句丽或是朝鲜通信使的问题亦是如此。在思考江户时代的外交关系时，朝鲜通信使或是竹岛（独岛）的问题也是如此，不应从日本和朝鲜、或者说幕府与朝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思考。比如说如果是朝鲜通信使的话，需要考虑幕府、对马藩、朝鲜三者之间的关系，幕府并不是非常需要朝鲜通信使，最需要通信使的是对马藩。因此从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视点来看前近代的历史会存在局限性。反过来，通过反问民族国家对于我们东亚民众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可以意识到从东亚的视点出发重新探明我们三个国家的历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讲得有些仓促，还请各位谅解。谢谢。



讨论 2



历史分析与史实个案的关系

——以“蕃国接诏图”为例

桥本雄（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

序言

我是北海道大学的桥本雄。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使我能有机会参加到这样一个充满学知的讨论之中。在此，请允许我对以渥美财团、北九州市立大学为首的各相关单位表示敬意。

本次的主题是“国史间的对话”，我想，我们接下来具体需要做的就是，探讨如何去推动各方的对话。先前三位教授的报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多角度客观地看待民族中心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史”究竟是什么？具体来说，国史究竟指的是人们的叙述、对历史的认知、历史观等层面的东西，还是指单独的历史事实、现象这种近似于年表的东西呢？当然，这两者有时很难被截然分清。有时会先有历史认知，再从这一认知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找出单独的历史事实；有时我们能通过历史事实个案纠正对历史的认知，或者是颠覆以往认知。我认为历史认知与史实个案就像是一个圆，相互循环相互影响。

我们在进行讨论的时候，说起历史认知问题，大多都是关于领土以及慰安妇这类问题。但是，不仅限于这种当下的现实问题，就像我所研究的15世纪至16世纪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在我们思考历史认知与史实个案的关系时也非常重要。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

1. 中国方面所构想的藩国国王接待明史的礼仪

这是记录明朝外交礼仪的指南《大明集礼》里的藩国接诏图（图1）。明朝会向日本、朝鲜、琉球、安南等各国、藩国派遣外交使节，将诏书、敕书或是命令带往各国。这幅图就是具体展示藩国如何接受国书或是外交文书的。这幅藩国接诏图还附有一篇名为藩国接诏仪式之礼仪的文章。换句话说，就如何迎诏这一点，我们将其动态化就会呈现出下面这种效果。

首先，这里标记有诏书两个字，国书便放于此处，同时明朝使节也站在这里。

图 1



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这幅图上面表示北方，下面表示南方。所以，明使相对于藩王是立北向南的。诏书的摆放也是面朝南方的。接下来，藩王来到诏书跟前焚香、跪下行礼，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名为捧诏官的官吏会负责将诏书置于桌上，之后再由另外一人打开诏书，再由不同的人宣读诏书。这个过程可谓繁琐。期间，藩王都要一直跪在地上，以额触地，行跪礼。

宣诏（读诏书）结束后，将诏书放回原处，即名为龙亭的盒子中。诏书全部宣读完毕之后，藩王俯首，行五拜三舞之礼，三呼万岁，随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音落下，仪式也就大致结束了。这便是中国方所构想的藩国国王接待明史的做法。

2. 足利义满对礼仪进行的改编

这种观念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深入到了日本人、日本学者、研究者的心中。我想，他们也不太可能所有人都看过这幅《大明集礼》的蕃国接诏图。不过，就例如足利义满在接受中国洪武帝或永乐帝册封时所行使的仪式来说，至今的日本史学研究者——可能中国的研究者也是如此——都认为义满立于南方而明使以及国书位于北方，所以一般认为义满对明帝是持谦逊态度，对国书是恭敬的。这种看法从册封、朝贡关系来看的确无可指摘。但是，要说在两国交往中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其实在日本是存有史料的。

其内容可以通过下图展示出来(图2)。首先，义满先来到庭院，于外门迎接明使。接着，同明使一道来到院子之后，自己便直接就坐并且面朝南方。之后，明使登殿献上诏书、皇帝的国书。义满阅读国书。之后，由于明朝的使节由正使与副使两人组成，所以大概会由副使献上回赐品并由义满接受，当然，日本将这些礼物称为贡品，即进贡之物。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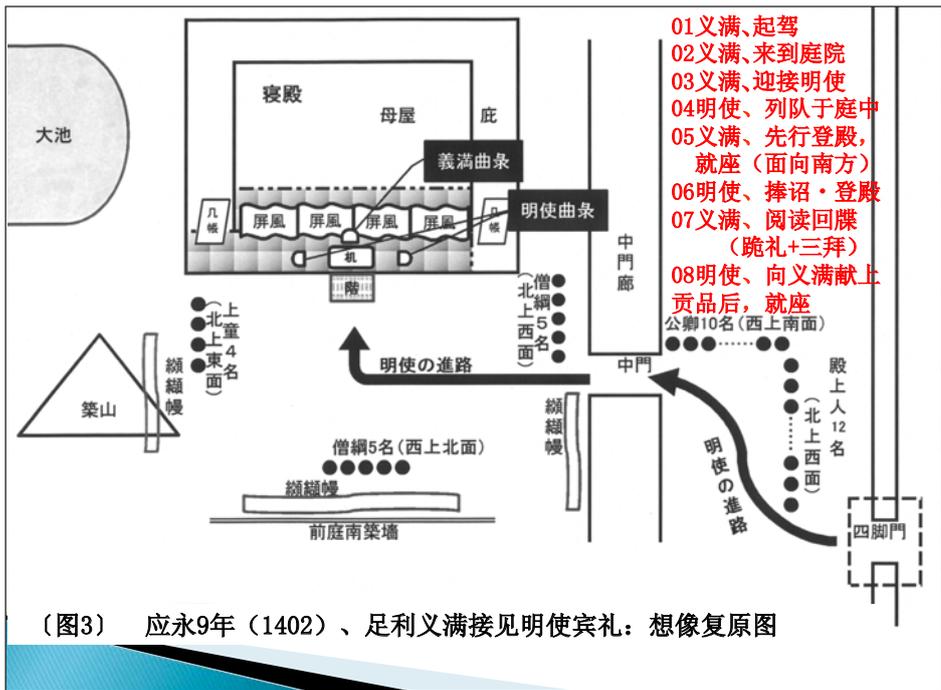


图 3



我还请插画家坂垣真诚先生将它画了出来（图3）。如图所示，义满坐北向南，明使恭敬地呈上国书。所以说，非常有趣的是，就连接受了册封·朝贡体制的义满，在国内行使的也是另一套礼仪。即，将自己认作世界的中心，而明使则是向自己送上贡品的人。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正如三谷教授、葛教授、赵教授所言，在我们以涉及各国共通历史的通史为对象构建历史叙述或编著史料集时，我想最理想的情况是，能为一个现象赋予多个角度的史料及叙述。今天我所带来的便是其中一例。



松田

中国教科书中描绘的日本 —教育从“革命史观”向 “文明史观”转变

松田麻美子（早稻田大学）

序言

中国的教科书是如何描述日本的呢？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说明：①中国教科书的简介，②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日本，③教科书内容逐渐丰富，④教育从“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的转变。

1. 中国教科书的简介（图1）

1985年以前，中国都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国家统一的教科书，即所谓的“一纲一本”模式。“教学大纲”会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非常具体的规定。在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同时担任“教学大纲”的制定以及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教育的目标是教导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革命史观。

1985年以后，教育改革开始。教育实现法制化，有了教材审查制度。中国开始了根据一个“教学大纲”编写不同教科书的“一纲多本”政策。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北京、河北、广东、四川及上海等地的教育机构编写教科书。这被认为是意在应对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使教育适应当地现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了实现教育的近代化、全球化，教科书中涉及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革命史观的内容变少了。2001年，中国引入了“课程标准”，在制度上将教科书的编者与审查者划分开来。“课程标准”只规定教科书必须收纳的条目，而不规定具体内容，这被认为是教科书编写权限的“下放”。教科书内容发生转变，思想核心变为重点记录文明进程、近代化的“文明史观”。中国进入了根据一份“课程标准”编写多部教科书的“一标多本”时代。

图 1

1 中国教科书的大体介绍

- 1985年以前：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统一教科书“一纲一本”。对内容进行具体规定。
- 1985年～ 教育法制化。实行教材审查制度。“一纲多本”。
 - 为应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自上而下改革
- 2001年：引入“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与审查得到分离。不再规定具体内容。
 - 教科书编写权限的“下放”，“一标多本”
 - 历史教科书从重视革命的“革命史观”向注重国家发展的“文明史观”转变
 - 目的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人治走向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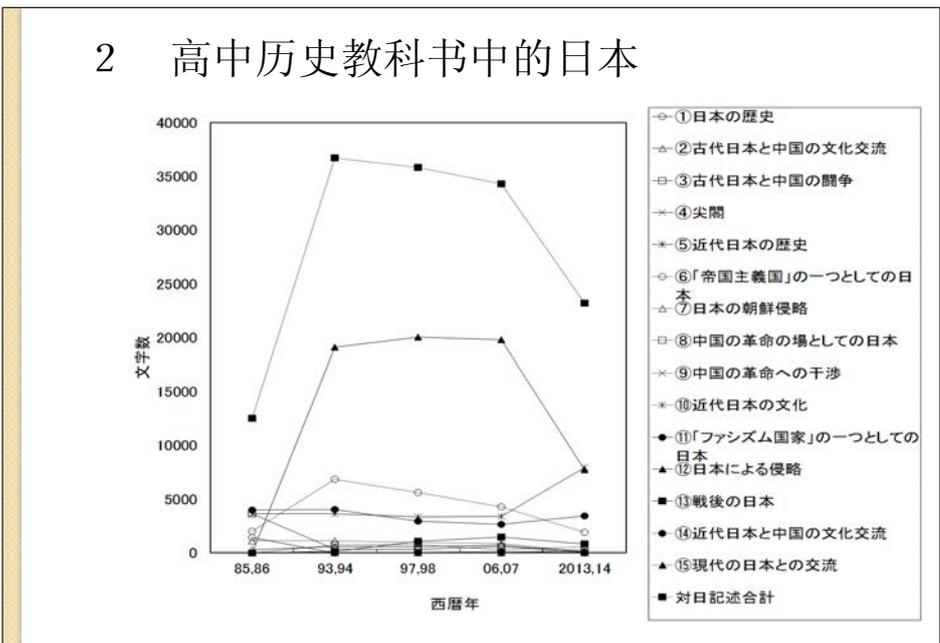
2. 高中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的日本

(1) 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日本相关内容的字数统计（图 2）

20 世纪 80 年代没有关于“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这是因为，80 年代高中只教世界史，太平洋战争仅作为与对德、对意并列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没有被特意定位为抗日战争。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高中开始同时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1993 年以后，“日本侵略行为”的相关内容增多。但是，进入 21 世纪，

图 2



中国采用“课程标准”后，“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大幅减少了（2013、2014年版教科书是基于“课程标准”编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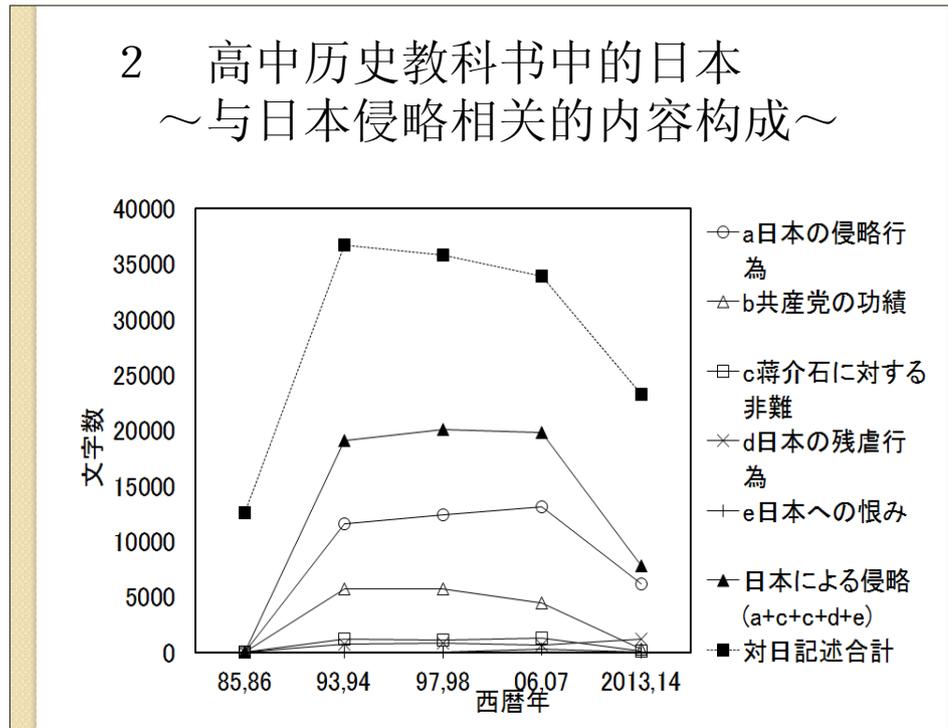
一直以来，无论教科书如何变化，“战后的日本”或“与现代日本的交流”等内容的比例都很少。另一方面，2013年、2014年版本里，主要介绍明治维新的“近代日本的历史”字数超过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字数。

根据“文明史观”制定的“课程标准”的教科书中，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变低，而使文明得到发展的明治维新获得了高度评价。

(2) “日本侵略行为”内容的构成（图3）

教科书中对日本的记述有一半是关于“日本侵略行为”的。“日本侵略行为”指的是抗日战争爆发、或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出兵山东等战争或战役。“日本侵略行为”的叙述里，“共产党的功绩”以及“日军侵略”占了绝大部分。但是在2013、14年版本中，“共产党的功绩”相关叙述大幅减少。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日本的暴行”相关内容一直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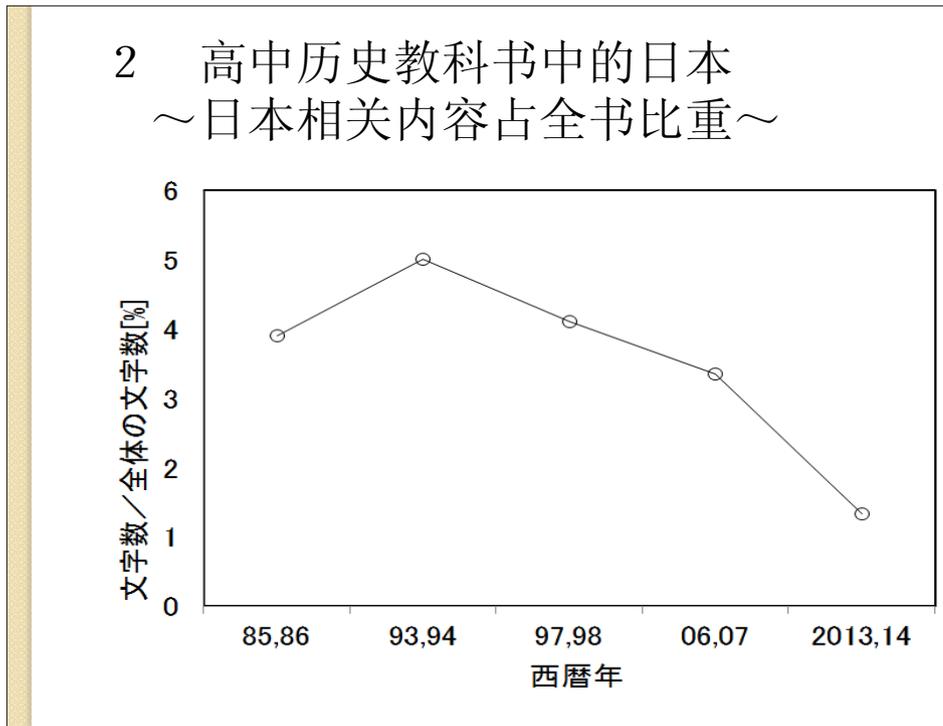
图3



(2) 教科书中对日记述的比例（图4）

日本相关内容占教科书全体的比例，在93、94年版本时有5%，之后渐渐变少，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2013、14年版本中下降到了1%左右（图4）。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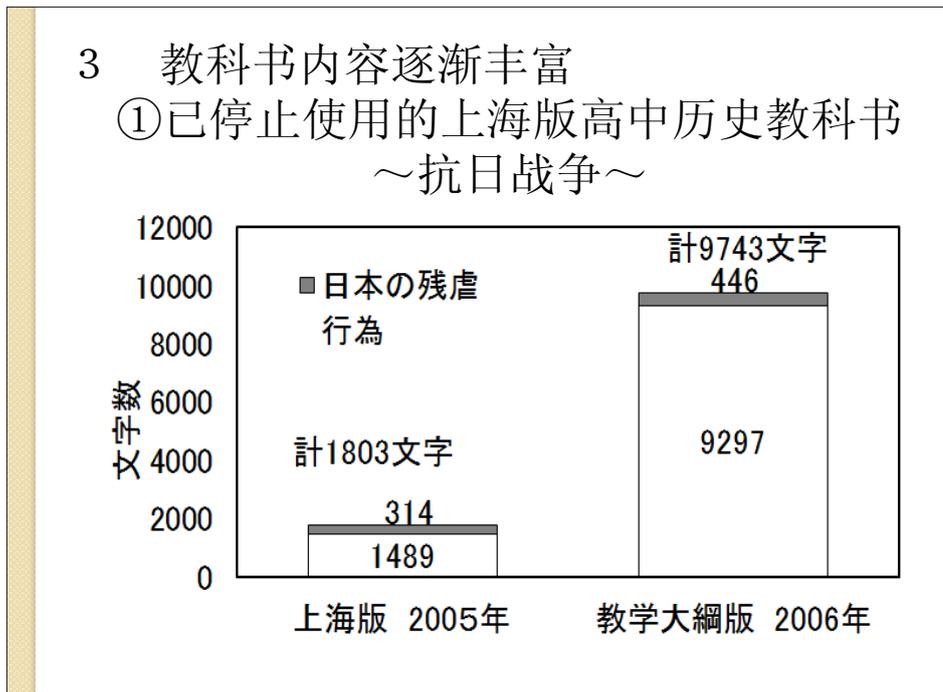


3. 教科书内容逐渐丰富

(1)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 (图 5)

与“教学大纲”下的 2006 年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相比，于 2007 年停止使用的上海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抗日战争的记述要少很多，内容也很简洁。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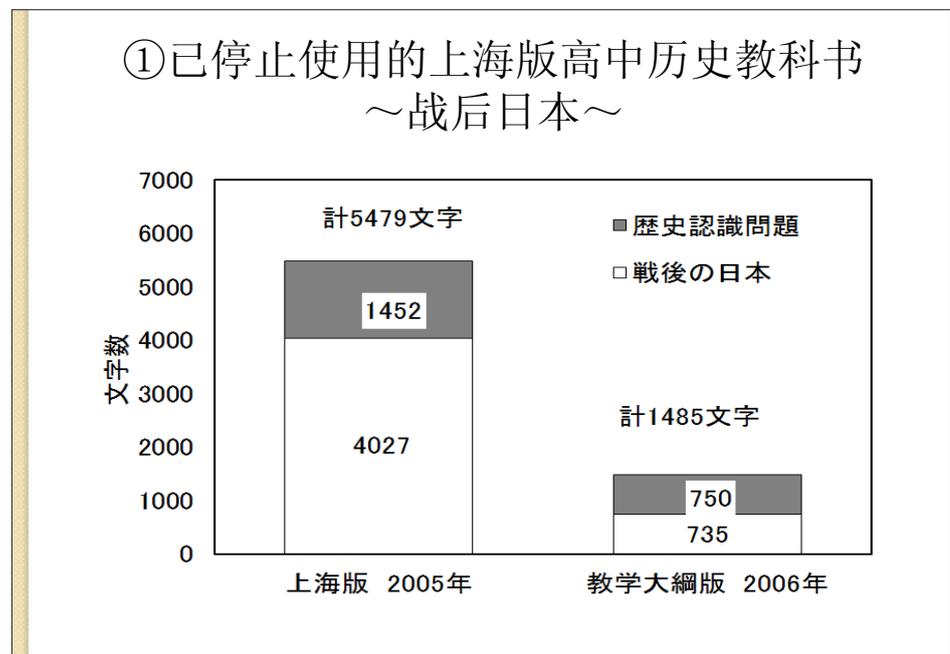


(2) 上海的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战后日本（图 6）

相比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学大纲版教科书，上海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战后日本的叙述要多得多。教学大纲版对于战后日本更多是采取相对负面的评价。涉及内容有远东军事法庭、旧金山和约、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野心、军费的增多，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或是指责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向亚洲人民进行谢罪。

相反，上海版中对于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给予了正面评价。“日本的战后改革，是明治维新以后使日本真正实现现代化的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战后的民主化是经济快速成长的起点”，对于宪法制定、财阀解体、农地改革、天皇制度的变化、东京奥运等国家建设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另一方面，如军费增加，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与德国相比战后处理不充分，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也有对日本的负面评价。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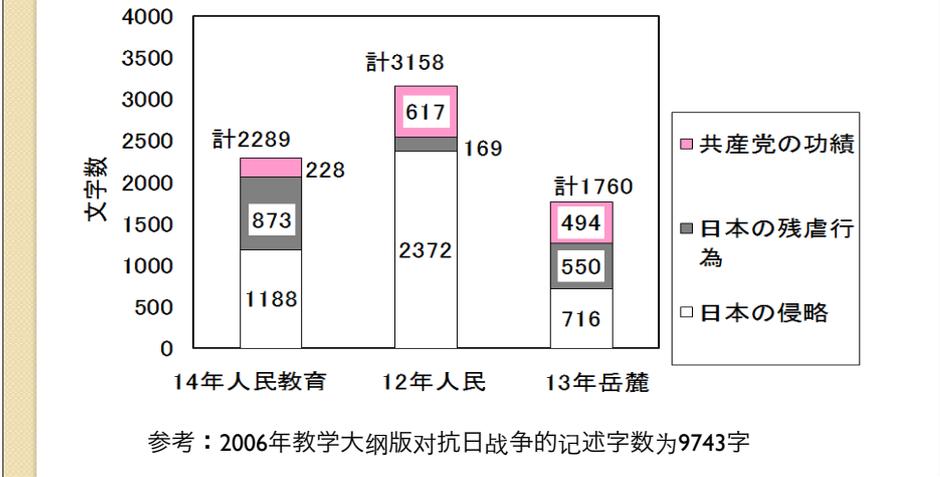
(3) 全国版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图 7）

现在使用的教科书中，占比最大的是使用率达 70% 的岳麓书社版。另一方面，人民出版社版是由课程标准制定组组长，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主编的教科书。对比两个版本，可以看出不同出版社之间对于抗日战争记述量的不同。

人民出版社版的内容与至今为止党的既定路线相近。抗日战争的死伤人数为 3500 万人，直接受损金额 1000 亿美元，间接受损金额 5000 亿美元等，书中也记录了党的官方说法。而岳麓书社版中，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建国这段历史仅占了一小节的内容，章节名为《新民主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长度只有 8 页。这可以说是不再强调共产党的功绩。与此相对的，“教学大纲”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教科书里，中国近现代史的两本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建国的历史。岳麓书社版中对于抗日战争的死伤人数、受损金额的记载并没有按照党的官方说法，而是写到“中国军人战死 130 多万人，物质受损金额 500 多亿美元，平民死伤者与财产的损失难以计数”。

图 7

②人民出版社（北京）、岳麓书社（湖南）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抗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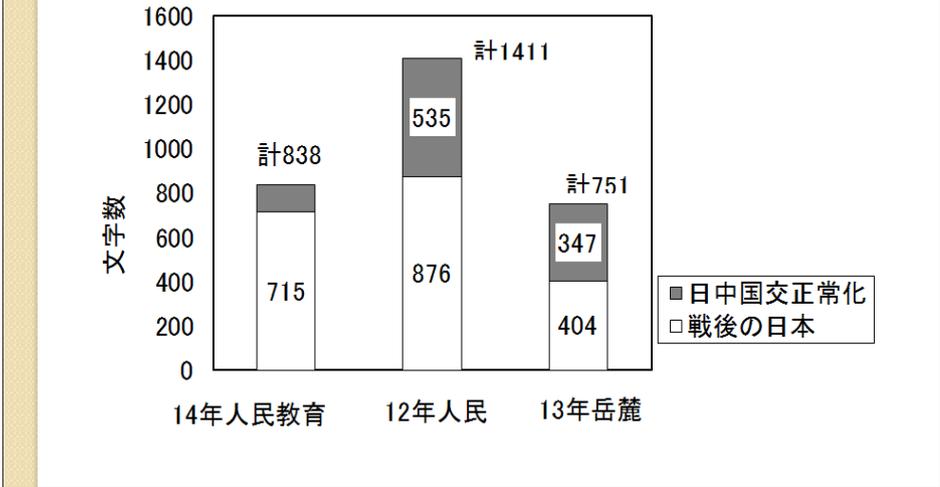


(4) 全国版教科书中的“战后日本” (图 8)

人民出版社版以及岳麓出版社版中，记载了日本痛感战争责任，表明深刻反省等中日共同声明的内容。对战后民主化、经济发展与重视教育等日本战后的发展也有说明。

图 8

②人民出版社（北京）、岳麓书社（湖南）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战后日本～



4. 教育从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的转变

通过对一些中国人的采访调查显示，他们对教科书有些许质疑，认为教科书只是宣传党的“正确历史观”，很难令人信服。这也是进行教育改革，采用“课程标准”

的背景之一。(图9)

教科书的作者们认为“也应该记录中华民族的过错。至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并没有为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在不知道基本史料的情况下，就被老师要求对历史进行评论”。另外也有人指出，“记录日本的侵略，是为了实现包含日本在内的和平。革命之后如何实现国家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教科书要正确重现历史，内容不能一改再改”。

中国在对日进行严厉的政治宣传的同时，教科书中对抗日战争的记述量大幅减少，不再刻意强调抗日战争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功绩的表述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也进行了肯定。

习近平上台以后加强了对言论的管制。一部分的学者向党中央提议，使教科书恢复到从前的单一版本的国定教科书形式。另一方面，“课程标准”是要在听取中央党校及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中国教育部拍板决定的。在共产党、中国国内，人们对于教科书的议论也相当热烈，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统一。

图9

4. 教育从“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的转变

- 人们对教科书的质疑。仅为宣传党的“正确历史观”、难以信服（根据采访调查）。→成为采用“课程标准”的原因。
- 也应该记录中华民族的过错。“教学大纲”的历史教科书没有为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在不知道基本史料的情况下，就被老师要求对历史进行评论”（大学教授）。
- 记录日本的侵略，是为了实现包含日本在内的和平。革命之后如何实现国家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教科书要正确重现历史，内容不能一改再改（大学教授）。

图10

- 中国在对日进行严厉的政治宣传的同时，不再刻意强调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共产党在抗战重点功绩），对日本战后民主改革进行了肯定。
- 习近平上台后状况有所倒退。习近平批判上海教科书。也有报道批评“课程标准”版教科书。去年年末在网上流传的未完成的新版“课程标准”内容倒退回“教学大纲”。
- “文明史观”视角下的“课程标准”是在听取中央党校及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由中国教育部拍板决定的。
-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统一。

讨论 4



如何正确认识东亚历史

徐静波 (复旦大学教授)

序言

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徐静波。今天受邀出席此次会议，我的发言主要根据赵珣教授、葛兆光教授、三谷博教授等三位教授的报告内容，阐述自己的想法或感想。

1. 听赵珣教授报告所感

首先，听了韩国的赵教授的报告，我感到特别是做历史研究、本国史研究以及国史研究时，很多时候都会涉及到周边的国家。赵教授以过去高句丽的历史为例，为我们展示出了中国与韩国的立场还是有很大分歧的。韩国将其看作本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中国至今都只将其看作中国地方政权之一。虽然并非全然不同，但中国与韩国的确在这方面有很大分歧。在大约 10 年前，中国出版了《渤海国史》与《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变迁》等相当有内容的研究书籍。但这些也都是收录于《(中国)东北边疆研究》这一丛书之中。“中国立场”还是非常强烈的。如果韩国的学者们有兴趣，也可以看看中国发行的高句丽研究与渤海国研究。总之，我非常赞同赵教授的观点。

2. 听葛兆光教授报告所感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葛教授在大约 5 年前，写了《宅兹中国》这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大作。而其中最主要的思想翻译成日语后形成了《中国再考》这本书。据说去年还是前年，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国再考》一时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并且取得了日本的第 26 届亚洲太平洋奖的最高奖。葛教授指出，从今日的政治形势出发去审视过去的历史，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可能会使人们陷入认识的误区。在今天的讲话中葛教授也说到，我们要尽量脱离现在的眼光，以当时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我对此也是完全赞同的。无论是对高句丽、对渤海国，又或是对此类的其他案例，我们的视角并不是现在的政治领域。我们不能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今天的

大韩民国或是朝鲜半岛的版图来看待它们，而应该回到当时的时代中，依据历史文献以及现在的考古学成果进行冷静的研究分析。

今天的发表里，葛教授就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各自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举了三个例子。这方面的内容葛教授在以前的论文里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而对于今天葛教授的报告，我想补充一点。葛教授所列举的四本关于中国国史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作品，当然，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有多次再版。特别是在我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前期，这些著作被作为教科书或是以其他的形式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就当下来说，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了。

3. 听三谷博教授报告所感

最后是三谷教授。首先，我听了韩国、中国及日本的三名学者的发表有一个共通感想，那就是内容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站在了一个冷静的学者立场之上。特别是葛教授还冷静地反省了以前有过很大影响力的中国国史著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否定。三谷教授提到，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将日本近代史理解为由“近代化”、“大众化”及“全球化”三个主流所构成的历史。看到这里我想，中日韩三国人民都还清晰地记得，1894年至1945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日本断断续续地经历了长达50年的战争年代。如果不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的反省，那还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主义吗，对此我表示怀疑。我曾拜读过一篇三谷教授的发言稿，里面写到“就日本而言，下一个阶段，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所谓‘帝国主义’的阶段是不可忽略的。对本国国土以外的其他语言社会进行统治……”。我想，这大概指的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吧。这些历史也是同理，如果无视这些历史，还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日本近代史吗，对此我也表示疑问。

中国人如果想要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认识日本近代史的，光通过教科书是不够的。从这一想法出发，我去年开始就一直想要把岩波新书的10本《日本近现代史》系列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读者也能读一读。我作为这项活动其中的一名策划者，与香港的中和出版公司合作，把这10本全部译成中文，计划在今年年末将10本全部出版。香港的出版物使用的是繁体字，所以也很难说能在中国大陆获得多少关注。但就我所知，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有计划要出版简体的10本《日本近现代史》。

小结

希望各国能充分认识到对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近现代史以及国史。并且我作为一名学者，也十分期待能在此基础上，像葛教授号召的那样，从民间层面、学者层面书写出一部东亚地区史。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讨论 5



开展“国史间对话”的建议

郑淳一（高丽大学副教授）

序言

大家好，我叫郑淳一，在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供职。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和点评让我受益匪浅。接下来我将以各位的发言和点评作为参考，在不重复的基础上，再谈一谈我的三点看法。

1. 为新的起点做好准备：把握已有事例

首先，由于我在大学的任职时间还很短，所以我还没有指导过研究生。但是经常会有学生来问我，应该怎样学习。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他两点——搜集所有相关资料；认真查阅已有的研究文献。而今天，我们就中日韩三国国史学者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创一个崭新的学科。在开启这个崭新学科的大门之前，我们必须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有过哪些类似的事例。最重要的是，过去是否有过中日韩三国国史学者展开对话的尝试，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尝试？

2006年，中日两国在安倍首相的提议下开展了历史问题的相关对话。刘杰老师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个事件。而之前的2002年，日韩两国成立了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工作了3年多的时间，赵珧老师从那时就已经参与了工作。2007年，第二期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成立，同样也工作了3年时间。2005年和2010年的3月，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报告书相继完成。虽说这是政府级别、国家支持下的共同研究活动，但是，当我们即将从一个崭新的起点出发的时候，是否也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呢？

另外，我们不仅能看到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努力，还能看到许多民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举一个我所知道的韩国的例子，目前日韩两国已经共同出版了多部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像《对话韩日史》（日文版书名：日韩交流史）、《朝鲜通信使 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等。同时也有中日韩三国共同参与编写的《开拓未来的历史》、

《新东亚近现代史》等优秀书籍。

希望以上几点能为大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尝试编纂中日韩三国关系史辞典

另外，刘杰老师也提出了刊行辞典的方案，刘杰老师暂时叫它《中日历史辞典》。为此，赵珖老师也提出了编纂中日韩关系史辞典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为了能够整体地、以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国家存在哪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它们之间有何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以韩国为例，一个叫东北亚历史财团的团体正在编纂《东亚关系史辞典》，虽然还未刊行，但目前已经进入最终修订阶段。如果本次会议计划尝试编纂中日韩关系史辞典的话，那么我们有必要制定一个日语里面所说的“初始方案”供大家参考和讨论。另外，近期将在韩国出版的这本辞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认为这些辞典将会成为我们打破壁垒的有利范本。

3. 韩国高中推行“东亚史”教育的尝试

接下来是第三点问题。早稻田大学的松田老师刚才从历史教育的层面做了精彩的发言。我稍微谈谈韩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在韩国，2014年起在高中阶段开设了“东亚史”这门课程，听说按照新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教科书从下个年度将运用到实际教学中。虽然在韩国国内针对“东亚史”课程及“东亚史”教科书有哪些优点这一话题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不断尝试寻找一种能使中日韩三国人民都接受的方案的话，那么韩国的这本“东亚史”教科书不啻一种有力的借鉴。

4. 补充：构建新一代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平台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虽然之前也有许多老师提到过，我再提一个类似的方案。那就是为年轻学者、下一代研究人员构建一个学术交流及对话的平台。AFC（亚洲未来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限定在历史这一领域的特殊性，与各位活跃在一线的老师进行交流与讨论固然重要，但是让那些更年轻的学者（再大胆一点的想法即中日韩的高校学生们）聚在一起，讨论彼此对历史认知的差异，为什么日本、中国会这样想？为什么韩国人总是重申这句话？让他们尽早地去接触到这些，并达成一个对历史的共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发言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讨论 6



国史中的用语统一与目标设定

金罔泰 (高丽大学校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

序言

大家好。我是高丽大学的金罔泰。之前只是在书中见过各位，今天能面对面与各位老师进行交流和讨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接下来，我将提出我平日里所思考的几点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将其简单概括为两点。

1. 用语的统一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我们东亚三国相同历史事件的用语统一起来。我的研究领域正好是刚刚有学者提到的“壬辰倭乱”。这次事件在日本叫作“文禄·庆长之役”，在中国被称为“万历朝鲜战争”。而韩国所称的“壬辰倭乱”中的“壬辰”是干支之一，这在某种意义上虽属于较为中立的用语，但“倭乱”中的“倭”（带有歧视色彩）字却是一个政治性用语。我认为这不应该出现在历史研究当中。

因此，我认为“壬辰战争”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说法。但就目前来看，如果在论文中使用这样的说法，并将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话，韩国民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情绪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发表人也会因此遭到口诛笔伐。这样看来，在本国之内达成用语的统一尚且如此困难，要使三个国家都统一起来就是难上加难了。强行进行用语的统一将会是一场困难重重的工程。在这个领域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各位老师对此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2. 研究国史的目的何在？

第二，我们应该以何种目的编写国史教科书？以何种目的进行国史研究呢？正如前面老师所提到的，迄今为止，我们在国史研究方面多倾向于培养本国自豪感、宣扬本国的光辉历史，也就是重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历史。但目前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有效的目标了。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应该走向何方？针对于此，刚才有许多专家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么各位老师对此又有怎样的见解呢？

以上就是我今天发言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圆桌会议·讨论

会议主持：南基正 / 总结：刘杰



南

非常感谢。我们预先指定的几位点评老师的发言到此结束。一开始我们是想找出争论点，然后围绕这个点展开讨论。但是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加上时间方面的原因，我发现争论并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讨论有争议的地方，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去发现问题，并分享各自的观点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接下来利用剩余的时间，我想把一些讨论得还不够彻底的地方重新提出来，来帮助大家更好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台下的各位老师如果觉得讨论的过程中还有没涉及到的地方，或是您更希望台上的老师能从某一方面去谈的话，无论是补充、意见，还是问题都请提出来。我们有两个发言的名额，提问之前请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如何对待朝鲜的国史以及历史教育

提问1

我叫川崎刚，是原朝日新闻的记者。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和技术方面，非常难，所以一直犹豫要不要提出来。今天的主题所涉及的区域当中包含了朝鲜这个国家。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朝鲜的官方说法呢？朝鲜也一定有自己的官方国史，我个人认为朝鲜方面对历史的解读一定与中日韩三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1950年6月25日，到底是哪一方的侵略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呢？如果将类似的内容写进像刚刚三谷老师提出的史料集里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想看的。

南

非常感谢。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还有时间，我们再请一位进行发言。

提问2

我是北陆大学的李钢哲。虽然我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但是我也很关注刚刚各位历史学专家所提到的内容。听了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让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收获很多。我不用借助翻译就能听懂今天会场上三门语言，能够听到中国、韩国、日本的老师原汁原味的发言，这对我来说是很舒服、很难能可贵的一种方式。

今天各位老师发言的主题是探索不同国家的史学家们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我的研究领域虽然不是历史，但最近我也开始在北陆大学担任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一些历史课程的教学工作，所以也在学习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研究历史的学者，以及编写历史书的专家，他们的初衷和想法其实与当今的教育现状是有出入的。特别是在日本，高校中的历史教育只涉及明治维新以前的部分，而之后的部分基本上是一带而过，这也是广受诟病的一个地方。我在教近代史和中日交流史的过程中也深有感触。当我跟日本的学生聊到近代史的时候，学生们要么是没兴趣，要么压根不知道。甚至有些学生连明治维新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当然其中也有学习能力等因素，但是，对历史关注不够，历史教育的方式、方法导致国民历史教育无法有效

进行。

我不清楚现在中国和韩国的教育现状是怎样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中国反倒是把教学重点放在近代史上，而日本却恰恰相反。可以说，各个国家的不同立场都反映在了历史的教育工作中。当今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纷争不断，我们前人栽树，就是为了荫蔽未来的年轻人，让20年后、30年后的年轻人能够从整个东亚的视角出发，去了解真正的、各方都认同的历史。那么，为此我们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进行有效的历史教育？针对这几方面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建议和启发。



构建亚洲共同的未来，“历史”、“史学家”能够做些什么？

南

非常感谢。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想请已经发过言的三位老师针对刚才的提问进行回答和评述。然后请刘杰老师进行最后的总结性发言。

接下来，老师们可以将刚刚发言中没提到的，或是遗漏的地方作为重点再次发言，或者在今天的交流过程中有新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但是有一点希望三位老师都能回答一下，那就是在最开始提出问题的环节中提到的——为了构建本地区“学知共同体”和亚洲共同的未来，历史和史学家们都能做出哪些贡献？以及现阶段本地区“学知共同体”的现状如何？未来该去往何处？包括台上的几位老师在内，我们这些学者又能做些什么？为了能让在场的各位老师充分理解和掌握，请三位老师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尽量详细和具体。

根据前面发言的顺序，让我们首先有请赵老师。

赵

听了各位的发言，我发现今天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构建亚洲整体的历史，如何使各个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达成一致。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固有看法是很重要的，我也同意这种观点。但就目前来说，我

们有必要以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历史是事件本身和后人解释的结合物。同时，历史又是一种生物，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中正确地解释历史，才能构建起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地区共同体和亚洲共同的未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促进各方相互理解这个问题上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认为青年之间的交流，以及更低年龄层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所有的交流都应该具备当今的时代特征且同时进行。比如青年、青少年、政府、NGO，这些不同层面的交流都应该同时进行。我曾长期参与到政府对话的相关工作当中，这些工作经验让我认识到，NGO层面的交流带来的效果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甚至比政府之间的交流更具深远的意义。在政府间的交流过程中，政府有时不得不代表本国民众的意愿发声，这在历史认识·理解的层面上是必须警惕的。所以，各国的民间交流首先必须足够成熟，同时政府间的交流也要及时跟进。

我参与到日韩历史对话相关工作中时正值小泉担任日本首相，也正是小泉首相的提议促成了那次对话。但是在那之后经历了各种风波，今天，日韩官方的历史对话已经被搁置。政府之间的对话必须要持续进行，民间对话更应该大力推进。我们谈亚洲历史，就是要达到共存、共荣、和平的目的。中日韩三国必须共存共荣，共同享受和平，这才是历史的重要价值。我们要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必须秉持这样的观念去解释历史，同时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一点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向未来，将这种史观传承下去。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几点内容。谢谢大家。

南 谢谢。接下来是葛老师。

葛 我对赵老师的话深有同感，完全赞同。打破国家立场的限制是我们在场每一个人的基本共识。实际上，在听完各位老师的发言之后，我又有了一些新的启发，接下来我就谈谈我的感想。

首先说一下赵老师的发言。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单词，一个名词，所以它代表中国这片土地和国土上孕育出来的所有国度。然而在现在的中国，这种观念和立场已经被纠正了。曾经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地和国土上的国家并不是当今意义上的中国，或者说，它们与现在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多大关系。这种观点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

再一个是刘杰老师提到的“国史”一词。在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不使用“国史”这一名称。那么，中国什么时候使用“国史”的说法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国史大纲》。那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时，“国史”一词也被拿来格外强调。还有就是在中国取得历史性的发展和繁荣的阶段，民族主义高涨，“国史”一词也常被提及。所以在东亚，特别是我们东亚三国，一个是在民族存亡的时刻，还有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提到“国史”这个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所以必须从国史所包含的意义这个视角进行研究。

还有一点。所谓国史，究竟是历史认识？还是历史叙述？这是刚刚桥本老师所提到的。当我们跳出国史的范畴时，我们就必须更新历史认识，改变历史叙述。要想在历史研究上挣脱国史这个概念，就目前来看，东亚三国中属中国最为困难。

中国目前还不是能够挣脱的时候。在日本和韩国一直存在“东亚史”和“东洋史”这两种说法，但是在中国很少能见到“东亚史”和“东洋史”的概念。所以，超越国家立场的限制去记述历史，中国是最困难的。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力量的话，那么共通、共享的历史目标也就无从谈起。被国家和政府牵着鼻子去记述历史，这在中国自古有之，而且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要想脱离国家的框架、超越国家的立场，记述我们东亚各国共通的历史，我们就必须克服四个困难。一，政治制度。二，意识形态。三，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四，记述历史的习惯或倾向。只有克服了这四点，我们才有资格谈共通、共享的历史。

南 非常感谢。接下来有请三谷老师。

三谷 会议开到后半部分，各位老师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东亚地区所开展的“学知共同体”到目前为止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刘杰老师个人，以及他在十多年就已经开展的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还有像刚刚提到的，民间的跨国交流项目也不乏成功案例。这些工作所带来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所有积累。老实说，本世纪初刘杰老师邀请我一同参与中日共同研究的时候，我是有点害怕的。也没有明确说出来，总之就是对对方心存忌惮。所以在开始后的三到四年里，当我意识到没什么可担心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能够消除对彼此的恐惧心理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同时，防止这种恐惧心理死灰复燃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眼前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做？也有许多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其中最紧要的一点体现在大学的历史教育上。几乎所有的学生对历史都不感兴趣，尤其是日本人，对邻国漠不关心、或是尽量回避，这是真实存在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文部科学省正着手将“历史综合”考量方式引入到高校的历史和地理科目中，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学生们提前准备好资料，围绕一个具体论点，随意、自由地进行讨论。虽然也有不理想的时候，比如有时结论会偏离正轨。但是，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会把它当成自己身边的事来看待。背教科书这个方法是完全没有意义，背了也会马上忘掉。在日本，有很多高中老师为此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能不能被其他老师所借鉴，进而推广到全国，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其次是葛老师的意见。葛老师强调应该推进东亚地区的共同研究，编纂共通的东亚史。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沿袭之前的老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把一些顶尖的人才聚集起来，圈定一个主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编成一本书。就现在来看，这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也很有意义。但是面向大众的，比如面向高校的三国共通的教材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把这两点搞混了。

我本人也编写过面向大学的东亚史教科书，也出版了，在韩国也有译本，但是暂时还没有中文版。这本大学教科书写得非常清晰明了，就算你不看其他的书也能大致掌握重要的知识点，所以我认为那次出版是取得了一些成效的。但就今天来看，这本书是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为什么大家只喜欢编写过于简略的大学和中学教科书

呢？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早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是史料集的问题。一旦真正进入到编写阶段，就必须进行三国语言的互译，编写过程中还需要有口译人员，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操作起来会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题目，而且让谁来干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日本，往往让一些年轻的学者去动员研究生，让他们参与到工作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但是有一点，如果这些学者是日本人的话，那么他们的专业领域肯定是中国史或韩国史，而不是日本史。所以这里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动员研究日本史的学者。

真的就像谚语里面所说的，“百思不如一试”，真正开始尝试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而那些亟待解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近现代部分，我一直觉得，只要开始了，一般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我本人已经没有时间参与主导工作，所以具体怎么做我也不清楚。虽然刚刚赵老师和葛老师都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要想跨三国同时操作的话，那必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所以目前也只能让有为的少数学者先开始工作。

南

谢谢三谷老师。会议的最后，有请刘杰老师进行总结。

刘

感谢各位老师的发言和点评，大家辛苦了。最后一位老师的发言已经将今天的内容概括得很全面了，但是我还想狗尾续貂、补充几句。本次会议是以“国史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所谓的“历史对话”了。在东亚，类似的尝试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是这次不同的是，我们第一次将这样的对话定位为“国史对话”。我认为，这次对话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另外，就像前面很多老师提到的，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对话都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流的，而本次对话是在各位学者、以及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组织下进行的一次自发性的对话。从这一点来说，本次会议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说得直白一点，之前的对话很大程度上是以伸张己方立场、或是说服对方为目的的。而本次对话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理解对方。这样方向上的转变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正是未来历史对话的意义所在。

如果把本国的史观、国史比做一个圆的话，那么在自己这个圆的外部还存在着许多同样的圆。我们这些国史研究人员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跳出自己的圆，进到旁边的圆里，去看看人家里面是什么样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对话。本次会议教会我们的不正是这样一种看待问题的意识吗？

各位老师也给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比如三谷老师提出的编纂历史史料集、赵老师提出的编纂三国历史辞典等。无论哪一个都是非常巨大的工程，至于接下来应该怎样展开，我想同各位老师一起，通过“国史对话”项目来将它们一一具体化。

刚刚今西女士说，至少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想要坚持做下去。我能充分感受到今西先生的决心，但是眼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明年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有一个方法是可行的，比如编纂史料集，或者编纂辞典的时候，我们先定下题目，然后让大家想一下你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都在用哪些史料，然后把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块儿，互相看一看别人用的都是什么史料，最后再对这些史料进行说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

具体今后应该怎么把这个对话持续下去，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我也想跟各位老师一同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渥美财团的牵头和支持也是将对话持续下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我想对今西女士以及各位财团的朋友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同时也衷心希望这样的对话和研究活动能够一直办下去。

今天的会议时间很长，各位学者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衷心感谢大家！



后记

今西淳子

2016年9月30日(周五)上午9点到12点半,“日中韩国史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在日本北九州国际会议场的国际会议室举行。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历史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能容纳88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充分显示了人们对该主题的关注程度。

会议开始,早稻田大学刘杰教授以“提出问题”的形式,作了题为“‘国史’与‘历史’之间”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国史“为何进行‘国史’之间的对话?”、“由‘国史’走向‘历史’”以及“培养能够进行对话的‘国史’研究人员”三个部分。刘杰教授肯定了近十多年日本、中国和韩国在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展开对话的成果,以及伴随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大学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所带来的由“国史”向“历史”的转型,同时指出为了将“国史”之间的对话落到实处,在进一步加强目前研究人员交流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10年后或者20年后开展正式的国史对话创造良好的环境。

高丽大学赵珖名誉教授通过分析近年来韩国出版的学校教科书、学会的日本关系史和中国关系史方面的叙述,指出东北亚历史问题起因于本民族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赵教授的报告内分为三个部分。(1)“有关前近代中国的叙述”,通过介绍高句丽的混乱提及“华夷意识”;(2)“有关前近代日本的叙述”,在结论中强调,“作为文化不发达国家,前近代日本是朝鲜先进文化的受益者,也是朝鲜的侵略者。韩国发行的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大体上都是如此。这种叙述相对妥当,但是并不准确。这种没有将日本当作一个完整的关系主体的国史教科书认识,对解决当今与韩国相关的诸多难题,建立正确的韩日关系起不到作用”;(3)“有关近代东亚的叙述”,19世纪以后,东亚三国的历史相互交错,不可能仅凭本国的状况来叙述本国历史,然而韩国近现代史的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史的内容,即便是朝鲜战争,教科书里充斥着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说明,却看不到对各国参战缘由的介绍。叙述近现代史,需要把中国史和日本史串接起来进行理解。赵教授认为,了解本国史固然重要,如何更好地了解他人也很重要。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以“蒙古袭来”(1274、1281)、“应永之役”(1419)、“壬申丁酉之役”(1592、1597)为例,论述了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存在的差异。站在一国史的立场上来看的话,某个圆心的中心部分会很清晰,但是周边部分却变得模糊不清。如果存在几个圆心的话,就会相应形成几个历史圈,出现重合的部分。探讨东亚史,有必要凸显这些重合的部分。比如,日本史的叙述是,由于蒙古袭来,日本首次被当成“神国”,从此产生了日本文化独立的机缘,从中国的“华夷秩序”中摆脱出来。而高丽则被蒙古化,蒙古人入侵日本时,成为蒙古的前线基地。另一方面,在中国,蒙古/元朝被当作“本国史”,蒙古袭来没有发生在中国国内,而是发生在蒙古与日本和高丽之间。综观整个东亚,蒙元侵略日本(或者说将高丽变成属国)可以解释为不仅在东亚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唤醒了各国的自我意识,引发东亚“中国中心”的风潮逐渐发生变化。同样,应永之役的发生和解决,带

来了随后数百年东亚国际关系的稳定。“壬辰之役”则大大动摇了此前稳定的东亚国际关系，虽然为后来东亚共同拥有的身份认同的瓦解埋下了伏笔，但当时该事件迅速得以解决，东亚的平衡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西方列强以武力进入东方为止。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蒙元侵略日本和占领高丽，只不过是反映了蒙古人统治世界的野心，进攻朝鲜的对马只是邻国纷争，而“壬辰之役”中，则明确指出日本是侵略者，作为朝鲜的国际友人，中国与朝鲜携手打败日本侵略军。葛教授认为，如果历史学者站在东亚史的角度重新进行审视的话，就会得出新的认识。

为促进国史之间的对话，东京大学三谷博名誉教授首先谈到日本高中历史教育课程的修订问题，还指出了日本史教科书中有关世界与东亚记述中存在的问题。“历史综合”将成为日本高中的必修科目。该科目有三个特点，分别是将世界史与日本史进行融合、聚焦近代史以及鼓励主动学习。但是，学会和教育会是否助力推动这种动向尚不明朗。三谷教授指出，在日本史研究和教育方面，最近发生的邻国关系的恶化，给让日本回归东亚的研究势头泼了一盆冷水，是否能够超越来自内外的政治压力，从而进行长期而有意义的研究，这一点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三谷教授还强调，从长远来看，(3)应该互相学习邻国的国内历史。三谷教授最后总结道，中日韩三国的知识界都热衷于欧美，而对邻国的漠不关心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令人极为担忧，不仅是国际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对方国家的思路，而不是自认为已经了解邻国的历史，相互虚心学习，这才是“国史之间的对话”所面临的终极课题。

在韩、中、日三国著名历史学家的报告之后，6名年富力强的研究者针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点评发言。

北九州市立大学八百启介教授试图通过指出中日韩的差异来梳理不同的观点，针对东亚与近代的关系，介绍了以下几种观点：(1)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近代”“东亚”的批判，(2)有关“东亚”概念的妥当性。

北海道大学桥本雄准教授通过还原1402年足利义满接见明朝使节时的礼仪，对足利义满如何既要向明使表达敬意，同时还要彻底地满足自尊意识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描写日本史时当然需要沿用对外关系史的成果，但绝不能简单而天真地全盘接受外国历史的叙述。要注意双方不同的立场，用实证的方法比照各国史料，冷静地进行判断，否则“国史”就会发生偏向。

早稻田大学松田麻美子的发言以“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从教育的‘革命史观’向‘文明史观’的转变”为题，介绍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指出习近平政权成立后出现了倒退现象。

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认为要正确认识东亚历史，不应拘泥于本国的立场，应当拥有更宽广的视野。不要仅靠本国资料，应当尽可能利用各国的历史资料、考古学的成果客观地进行考察。

高丽大学郑淳一先生仔细调查了至今开展的官民历史对话的案例，指出，为了

更好地进行“国史间的对话”，重要的是分析之前的案例与本次“国史间对话”项目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寻找有意义的课题。同时建议促进青年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包括加强中学生的“对话”或学术交流等，比如参考韩国高中“东亚史”的经验，共同思考东亚“国史”的叙述方式。

高丽大学金因泰先生提出了如何决定相同历史事件相关用语的问题，指出不要使用“壬辰倭乱”，而最好改成“壬辰战争”，但是在韩国还存在“从韩国人的感情上来看时机尚早”的反对意见。另外，从前“国史教科书”与“国史研究”的“目标”是“自信”“骄傲”，但是这种目标如今已经过时，必须反映各国的政治历史特征。

此次圆桌会议的缘起是（公益财团法人）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自 2013 年 3 月于曼谷举办的第一届亚洲未来会议中的圆桌会议“全球化时代日本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为开端，经过多次讨论，在 2015 年 7 月东京举办的“日本研究的新范式”上，由早稻田大学刘杰教授提议创设“作为亚洲公共学知的日本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次圆桌会议在第三届亚洲未来会议上首次举办，今后将作为一个正式项目连续举办，共 5 次。今后将不断聚焦主题，为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以及韩国的韩国史研究者提供对话和交流的平台。

本项目的特色之一是语言问题。本次会议由以下 6 位提供同声传译。【日语 ⇔ 汉语】丁莉（北京大学）、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 ⇔ 韩国语】金范洙（东京学艺大学）、李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汉语 ⇔ 韩国语】李丽秋（北京外国语大学）、孙兴起（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后将尽可能以同样成员继续下去。

本次会议的内容将整理成 SGRA 报告书，分别发行日语版、汉语版和韩国语版。



■ 刘杰 / LIU Jie

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1982年考入东京大学。1993年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博士（文学）学位。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专业领域是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近代日中关系史、现代日中关系论、现代中国论。对日中历史认识问题及背景尤为精通。

主要著作：《日中战争下的外交》（日文、吉川弘文馆、1995年）、《中国的强国构想—自甲午战争后至现代》（日文、筑摩书房筑摩选书、2013年）等。

■ 赵珺 / CHO Kwang

1945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主攻朝鲜时代思想史、史学史、关系史。高丽大学文学博士。曾任东国大学国史教育科教授、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教授·文科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延世大学硕座教授（企业或个人捐助的指定教授）、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委员长、韩国史研究会会长。现为高丽大学名誉教授、首尔特别市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主要著作：《朝鲜后期社会的转型期特性》《朝鲜后期社会之理解》《韩国史学史的认识与课题》《朝鲜后期天主教史研究》等。

■ 葛兆光 / GE Zhaoguang

1950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献学硕士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13年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现为该研究院及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当选为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者。

专业领域是中国思想史、东亚交流史。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中国再考》（获日本第26届亚洲太平洋大奖）等。

■ 三谷博 / MITANI Hiroshi

1978年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国史学专业博士课程后退学。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学习院女子短期大学专职讲师·副教授、1988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副教授之后、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现为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东京大学）。

专业领域是19世纪日本政治外交史、东亚区域史、民族主义·民主化·革命比较史、历史学方法论。

主要著作：《明治维新与民族主义—幕末外交与政治变动》（日文、山川出版社、1997年）、《思考明治维新》（日文、岩波书店、2012年）、《爱国·革命·民主》（日文、筑摩书房、2013年）等。合著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中对话的尝试》（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与刘杰·杨大庆等）等多部。

■ 八百启介 / YAO Keisuke

1982年九州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1989年修完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后退学。文学博士。1985/87年作为荷兰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留学莱登大学历史系。1989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现为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专业领域是日本近世对外交涉史、食文化史。

主要著作：《近世荷兰贸易与锁国》（日文、吉川弘文馆、1998年）、《砂糖经过之处—从点心看社会史》（日文、弦书房、2011年）

■ 桥本 雄 / HASHIMOTO Yu

1972年生于东京。199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2000年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后退学。2004年获得博士（文学）学位。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九州国立博物馆成立准备室、九州国立博物馆学艺研究员，现为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

专业领域是中世日本国际交流史·文化史。

主要著作：《中世日本国际关系》（日文、吉川弘文馆、2005年）、《中华幻想》（日文、勉诚出版、2011年）、《虚假外交使节》（历史文化Library、日文、吉川弘文馆、2012年）、《‘日本国王’与勘合贸易：足利将军缘何向中国皇帝‘朝贡’》（追溯日本史：外交篇[7]室町、日文、NHK出版、2013年）等。

■ 松田麻美子 / MATSUDA Mamiko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生。国际关系学、中国戏曲文学硕士。1974年生于大阪。1995年留学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1998年毕业于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系。2002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硕士课程（中国戏曲文学）。2015年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硕士课程毕业（国际关系学）。同年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

主要著作：《中国教科书中的日本—从教育‘革命史观’到‘文明史观’的转型》『（日文、国际书院、2017年）。

■ 徐 静波 / XU Jingbo

徐静波、1956年生于上海。1988年复旦大学近代中国文学硕士。现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所长、教授。曾任爱媛大学外国特聘教授、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文化研究科招聘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等。

研究领域是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

主要著作：《梁实秋—传统的复归》（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有多部合著、编著、译著。

■ 郑淳一 / CHONG Soonil

1979年出生于韩国。2004年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毕业（文学学士）、2007年高丽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硕士课程毕业（文学硕士）。2008年获早稻田大学亚洲特别奖学金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获2011年度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奖学金。2013年获得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明知大学（韩国）助教授，2016年9月起任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科副教授。

专业领域是日本古代史、东亚海域史。

主要著作：《九世纪来到日本的新罗人与日本列岛》（日文、勉诚出版、2015年）、《日本古代外交文档》（合著日文、八木书店、2014年）、《古代东亚的“祈祷”》（合著、日文、森话社、2014年）等。

■ 金因泰 / KIM Kyongtae

高丽大学韩国史博士课程在读期间，2010-11年留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化研究专业（日本史学）。2014年获得高丽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现为高丽大学人文力量强化事业团研究教授。

专业领域：非常关心战争的破坏性本质与因战争而带来的荒土上不断成长的和平之间所存在的历史。

主要著作：壬辰战争期媾和交涉研究（博士论文）。

同声传译
译员

【日语⇌汉语】丁莉（北京大学）、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韩语】金范洙（东京学艺大学）、李和丽（韩国外国语大学）

【汉语⇌韩语】李丽秋（北京外国语大学）、孙兴起（北京外国语大学）

SGRA レポート バックナンバーのご案内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步」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白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プ、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惠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 + 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プ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発行、英語版2003. 3. 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発行

-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発行、英語版2003. 6. 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8.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栄濬
2003.12.4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2004. 6.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2.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裕、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1.24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ジ、朴 栄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宮島 喬、ヤマグ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マキト
2006. 2. 20発行

-
- SGRA レポート 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ー留学生ー」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8 第6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9 第2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0 第2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ャヤー・ムシカシントー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1 第2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蘭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ン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2 第2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4 第2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5 第3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6 第3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7 第3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8 第3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
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9 第3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0 第8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1 第3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2 第3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ブ・ティ・ミン・チイ、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3 第4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4 第3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
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 玄田有史 シム チュン 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
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 木村建一、高 偉俊、
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
葉 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
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 井上まどか、
ティーム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 蘭 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 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 SGRA レポート 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
朴亨國、金尚泰、胡潔、李成制、陸載和、清水重敦、林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
田多英範、李蓮花、羅仁淑、平川均、シムチャンキョ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1 第4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榮濬、
劉傑、林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成日、南基正、平川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 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 郭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4 第4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n 蓼科「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
朴榮濬、渡辺剛、伊藤裕子、南基正、林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5 第4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n 蓼科「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
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ョ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7 第1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
平川均、加茂具樹、金雄熙、木宮正史、李元徳、金敬黙 201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8 第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ィア・志願者論」
（日本語・中国語・英語） 宮崎幸雄 2014. 5.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69 第45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
村瀬信也、南基正、李成日、林泉忠、福原裕二、朴榮濬 2014.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0 第46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
荒川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ク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佳英 2015.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1 第47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
ー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と倫理ー」
崔勝媛、島蘭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
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物流を中心に」
李 鎮奎、金 雄熙、榎原英資、安 秉民、ドマン ホーン、李 鋼哲 2015.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4 第4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
劉 傑、平野健一郎、南 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5 第50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
神崎智子、齊藤淳子、李 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6 第9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二百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 建輝 発行予定
- SGRA レポート 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の模索」
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8 第51回SGRAフォーラム「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る—」
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榮濬、宋均營、林泉忠、都築勉 2017. 03. 27 発行

■ レポートご希望の方は、SGRA 事務局 (Tel : 03-3943-7612 Email : sgra-office@aisf.or.jp) 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SGRAレポート No. 0079 (中文版)

第52届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论坛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1)

编辑与发行 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3-5-8

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内

电话: 03-3943-7612 传真: 03-3943-1512

SGRA网页: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sgra-office@aisf.or.jp

发行日 2017年8月7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